

海外述林

月刊

The Crossroads

創刊號

第一



er
C3097.1
C7
1: no.1
1977: Jan.)
CANADA_HK

：移民，移民政策，華人，多元文化及其他（座談會）●我對全加華人代表大會及移民政策新方案的一些體會

發刊詞.....	同人	3
專題：移民，移民政策，華人，多元文化及其他(座談會).....	本刊編輯委員會	4
我對全加華人代表大會及移民政策新方案的一些體會.....	水	9
你！投票的結果.....	本刊記者	10
加國「兩種國家語文」的問題.....	於天	11
唐人街經濟動態——走訪多倫多商會簡報.....	本刊記者	13
民生與經濟(長篇連載之一).....	何棟生	15
魁北克省.....	魁北克國?	17
四度時空：一等公民和溫健驅的道路.....	向東	19
祂?.....	綠茵	
無題.....	金帛	
最後的一度.....	二丁	
加國風情錄之一——雪宅.....	(日)本多勝一著 龔念年譯	21
加國風情錄之二——溫哥華.....	方德	
「四人幫」垮台的前因後果.....	小平	22
中國政治鬥爭的實質.....	惠可	24
關於「發展中學教育」.....	國	26
關於一份雜誌.....	洪志	27
一封英國的來信.....	陳耀	
也是童話.....	方生	29
看電影·何處去.....	夸父	30
北美洲華僑史(長篇轉載之一).....	梁啟超	31
兄弟之間——魯迅與周作人.....	一丁	32
編者的話.....	編者	34
Editorial		35
Conversation with Canadian students returned from China		37
Random thoughts on the "gang of Four".....	May Tien	46
Chinese in Canada : From past to present	Mei Hua	50



發刊詞



過去三十年來，世情急轉，國事銳變；這期間，我們的祖國有着如日出般的壯麗美景，國人大量的海外移居亦予海外華人社區一個嶄新的形勢。六十年代中華國內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初期海外一連串洶湧澎湃的喚醒運動，確曾改變了許多中國人民的思想歷程。在醒覺年代底洪濤孕育中，新的事物不斷產生，新一代正逐漸茁壯。舊的一代已漸漸退隱到歷史舞台的背後去，新一代的我們決不做袖手旁觀的看客，而是投入演出的舞台人物。

不斷在洪流裏掙搏的經驗告訴我們，為了要認定自己底方向和位置，為了一方面與本地的同胞們齊心合力，爭取應得的權利，反對任何形式的壓迫，一方面又自覺地關懷祖國大地上同胞底幸福，督促當政者實現「民為貴，社稷次之」的基本國策，我們必定要站在時代的前端，敢於反潮流，與在認同的過程中否定盲目的惰性傾向。

范仲淹曾經說過：「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時代付與我們底使命亦正如此。

人生活於特定的時空裏，首先關注的，是他生活中底週圍環境，本地新聞和時事分析因此成為同寅月刊的主要內容。「本地」這個名詞我們作了如下的詮釋：狹義地，它所指的是加拿大；廣義的說，它包括間接影响加拿大人底生活程序的泛美文化體系。國是版和世界版的出現反映了刊物同寅放眼世界的胸襟。由於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我們暫且將國是版分為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三個地域來討論和研究。同寅寄望於它們早日的統一，我們也可以免除如是繁瑣的編排方法。月刊有限的篇幅是不容許時事版報導一般繁瑣的社會軼聞。同寅認為影响當地居民生活的社會問題，如能提綱挈領地報導和分析它發生底根由、背景和意義便足以達成時事版的任務。

唐人街底結構非僅是一系列的餐館及雜貨商店，它是代表僑胞的一個有形而複雜錯底社會組織。它的經濟含義除了提供部份僑胞就業的機會外，並得與當地既成的經濟體系作着緊密的合作和競爭，從而使它和賴它作為標記的唐人街得以持續下去。近年間，大量的僑商不斷地湧入各地唐人街，展開劇烈的商業競爭，急促地改變唐人街傳統上的經濟體系。這種現象的報導和分析是經濟版的主要課題。上層建築的領域，如電影、文學、音樂和藝術也是刊物同寅關注的問題，它使枯燥無味的生活變得充實美好。人類生活的複雜內容，它們底含義，透過常新的創造力，迥異的形式，不同的媒介表達，人類對生活底認識也許就更加透徹。

在實際執行編輯方面，每期的專題式討論將是刊物的重心，內容儘可能以有關本地華僑的切身問題為焦點。它的編寫工作則由月刊編輯委員會負責，其立論用以反映同寅對問題底看法。讀者不一定同意刊物的論議，「述林」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塊開放的園地，讓讀者抒發自己的意見。刊物同寅一致認為祇有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辯論下，問題的展現才能達到高度的明朗化，才可以更接近真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底大辯論在我國學術思想史上出現過極璀璨的時代。同寅刊物底論說，雖不一定做到「無一不佳」的境地，但若能達至「足以益人，足以傳世」，是同寅致力之所歸。

移民

移民政策

華人

多元文化

及其他

編者按語：

候鳥南遷，是生物適應自然環境的一種現象。人類在社會的進展過程中，漸漸克服了自然環境，創造了文明，亦製造了人爲的環境。對這個包了政治、經濟、文化等複雜因素的人爲環境，人們或主動地去選擇，或被動地迫於脫離，於是產生了人口流動的現象。由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人口的流動，就是移民。

華人移居加拿大，雖有百多年歷史，大量移民的情形，却是近十年的事。我們作爲旅居加拿大華人的一分子，自然對華人的苦樂，華埠的榮衰，華文的興廢等等，特別關心。尤其是影響華人將來至深的移民法例，更是我們密切注意的。

由於經濟不景，人口過於集中等問題，加拿大政府實行管制移民的措施。華人對此的反應，主要表現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下旬在溫哥華召開的全加華人代表大會對移民政策及多元文化等等的檢討。我們邀請了四位與會人士，談論一下這個具歷史性的會議。我們儘希望能反映各方面的事實，不論是正面的結果，或是我們須面對的一些問題或隱憂。

由於時間上的限制以及安排上未及周到，我們的話題未能全面及深入，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然而，如果能引發起讀者的興趣，則我們會感到這次安排座談會的工作，不是白做的。

出席：何澤生、佐治·胡醫生、陳宏志、葉求鐸律師
(按筆劃排名)

主席：李懷敏、方資求

主催：海外述林編輯委員會

整理：方資求

日期：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時間：下午二時半至四時半

地點：思雅書舍

李：今天我們聚在一起，主要是討論移民及華人等一系列問題。作爲海外述林的編輯之一，讓我簡單地解釋一下我們發起這個座談會的用意。我們這份雜誌的主要對象是海外華人，內容自然也是以海外華人所關心的爲主。去年八月下旬在溫哥華召開的「全加華人代表大會」是華人社區一個具歷史性的會議。我們希望對該會作出相當的報導和反映，所以邀請了你們四位與會者，得以知道一下實際情形。

方：在討論之前，讓我說明一下雜誌編者的態度。目前我們仍未採取固定的立場，祇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加以反映，所以希望大家能盡量發揮。此外還有一點須要聲明；政府在今年年末對綠皮書的決定會作公佈，我們談到的問題可能會失去時效性，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胡：提起溫哥華全加華人代表大會，確是一件創舉，大致上可以說是很成功的。但不幸與會時有兩派人因爲政治背景不同而產生衝突，導火線是雙方會前在報紙上做的文章。爭論的焦點是各所屬的團體在華人社區中是否具有代表性的問題。我個人覺得最好能將當時大會的情形作個切實的報導，勝於會後各抒己見。這個報導未曾有人做過，相信不是件簡單的工作，然而是很有意義的。大會曾編印了一份報告書呈上政府，跟當初原意是有頗大的出入，我們安省的代表未曾參與是項工作。除了你（指何同學）那份——，甚至你那份也受到篡改（當時胡君認爲爲了華僑今後團結起見，這種不愉快的事公開或保留，須主席慎重考慮。我們感到若果保留，也不能消除問題的存在，並且對這糾紛有所知悉的已不限於兩三個人，所以無須要掩飾。）我個人感到爲了華人社會的將來，就應該有更多正面的報導，從而產生較深刻長遠的影響。我寄望在你們的努力。我自己有部份資料可以提供，我個人是很樂意協助你們的。我覺得爲了華人全體着想，不應該爲了推動某種政治意識而製造出混亂和損害華人的團結。我個人這種意見曾向大會主席提出過。當然在大體上，這次會議可以說是成功的。我個人希望以後能繼續召開第二次大會。每一個華人團體都難免有一種偏向，要消除相互間的矛盾，是件相當艱難的工作，我提出這點，是希望大家加以注意。

方：胡君提及引起糾紛的一個問題，據我了解，這部份並未列入大會的議程，當時在怎樣情況下產生，希望大家講一下。

胡：在大會未開前，我們想預先將議程內容斟酌一下，因為我們對這議程有反對的地方。溫哥華方面是大會的主辦，他們有充分的時間，把議程先安排好了。在議程中提及全加華人聯合會，本是個富有建設性的提議，但由於他們在政治上有所偏袒，那是頗令人失望的。在政治上個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不應該對政見不同的人強人所難。站在另一個政治立場的組織，也表示了態度，我個人認為這是不應放在大會中討論的。趁着午餐的機會，我們會聚在一起商量，提出把這些問題放在小組中討論，可以避免嚴重的衝突，但遭到溫哥華主辦方面的反對，隨而在大會上表決，結果通過在大會上討論。當時有兩三個人臨時提出要在大會上討論，是項議案一旦通過，以後也沒辦法制止。這就是引起糾紛前奏的簡略經過。

陳：照我記憶所及，這是由於分發問卷(QUESTIONNAIRE)所引起。在議案中牽涉及中華會館這一組織，甚至有人提出要改組中華會館。在表決綠皮書，移民法例，對新移民的輔導和服務工作等等問題，以至於華人對加國社會貢獻的肯定，大家都和衷一致，所以都順利地通過，但在中華會館這一部份的代表間發生了嚴重的爭論，我個人認為有關個別團體的事不應該在大會上討論的。

方：大家提到的問題，相信是頗為複雜和微妙。不如我們回到大前提上面，即是移民綠皮書，多元文化等等。剛才陳君說在這些問題上，與會代表的態度一致，可否講一下這個一致性是怎樣達成的。

陳：當初溫哥華方面主動地派代表來，預先跟我們討論，當時胡君，簡律師和我都在場。他們事先擬了一個提綱，我們在大體上表示同意。我們覺得政府方面太過匆促，綠皮書在年初擬定，而民間團體的意見，在六月中旬前呈上才有效，在這短期內，我們難以完成研究分析和向羣眾徵詢意見等工作。大會八月下旬才開始，後來政府將限期延遲，才及時將呈文遞上。

胡：結果我們趕不及遞上，後來是由簡律師遞上給杜魯多。當初誤了期，不知應由誰來負責。至於綠皮書的反映，不同種族的移民各有統一性的組織向政府提供意見，華人社團仍缺乏這種全加性的組織。當初洪門民治黨會向政府遞上一份呈文，但政府基於該組織不能代表華人全體為理由而不予接納，後來中華會館亦呈上一份，政府以同樣理由加以拒絕。兩個社團聯名呈上，但政府也不認許。於是溫哥華代表來多倫多建議全加華人派代表開會，由華人負責三分一經費，籌五千元，其餘由移民局及國家秘書處(Secretary of State)分擔。政府肯花錢來辦這事，可說是第一次。得到了政府在經濟上的支持，大會有了實現的可能。我們事先在多倫多開會，當時與會者有二十多個人，由於多倫多在人力上欠缺，結果決定由溫哥華方面籌備。討論的內容主要是三方面：一是綠皮書，這是發動起會議的主要題目。一是多元文化。由於大會經費三分一是由國家秘書處支助，因此也要適從它的要求，討論多元文化。另一是成立全加華人的組織，目前華人仍未有註冊的全加性組織，如果政府有任何公佈涉及華人，是沒有辦法通知的，以後如果須要向政府交涉（正如目前對綠皮書意見的上呈），也須要有個具代表性的組織。以前我們未曾有這種組織的構想，而現在即要實現，所以有點混亂。這

工作組討論題目之提議

移民問題：移民政策之原則

經濟、人口分佈與移民關係

綠皮書之四項建議途徑

移民政策之執行

保證移民、撤回移民及獨立移民等各類移民之選擇

移民服務設備與公民權

新移民服務設備

固定性之移民服務設備

移民在多元文化社會中應起的作用

全加華人聯合總會：

有無成立之必要

代表大會應採取步驟

總會之宗旨

PROPOSED WORKSHOP TOPICS

I) IMMIGRATION : IMMIGRATION PRINCIPLES

1. Economy and demography in relation to immigration
2. Four options proposed by the Green Paper
3. Administration of immigration policy
4. Immigrant Categories

II) IMMIGRANT SERVICES AND CITIZENSHIP :

1. Immediate post-arrival services
2. On-going services
3. Integration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II) 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CANADIANS

1. Necessary or not ?
2. Actions to be taken by Conference
3. Objectives of Federation

全加華人代表大會工作組 討論題目之提議

次大會是促進互相了解的一個好機會，因此我們討論的範圍並不限於一方面，而是涉入了多方面的話題。

方：目前促成全加華人組織的一方面有沒有進展？還是因為意見分歧而暫時無法達成？

胡：也許讓我回到移民這個問題上，關於全加華人組織延遲些再討論。我們對綠皮書的意見，寫成一份呈文，雖然誤了期，由簡律師呈給杜魯多，結果順利地得到接納，由杜魯多交給國會小組（Parliament committee）。呈文的內容，可以參閱原文。該文每點在大會上逐一通過，幾乎都是一致的通過，不知道你對此有什麼特殊的問題？

方：我個人有個較特殊的問題。對於移民政策，政府在綠皮書擬定之前，早已實施嚴厲管制，例如移民須在外地申請等等，無須經綠皮書的通過才施行。請問綠皮書是對這種措施的一種解釋，例如經濟不景，人口分佈過於集中等等，還是另有目的？政府在實施了政策，然後徵詢民意，是否表現得虛偽些？

陳：我認為管制措施和綠皮書是兩回事。因為以前的移民法例有很多漏洞存在，有些遊客或探親的下了飛機便趕去移民局登記，如受拒絕可以再次申請，在等待通知期內可以做工。至於管制加緊，可能約在一九七二年十月間開始，那時自由黨居於少數黨地位，可能受到了政治上的壓力而作出了改變。到了一九七三年大放，我個人認為可能是為了照顧越戰逃兵役而留在加拿大的美國人。到了七四年開始加緊，移民不能在本土申請，到了十月，還要有工作的安排，不然扣十分，後來甚至工作的担保也要經人力部（Manpower）的批准，到了目前，還要視乎加拿大人力的須要，否則夠五十分也是枉然的。這種逐漸收緊的措施是行政上對移民臨時採用的方式，至於綠皮書則是長

期的方針，例如涉及人口的調整問題，要考慮到一百年內的改變。所以綠皮書並不是政府實行某措施後的事後解釋。

何：這個問題很難決定的。現存的法例，有相當大的伸縮性，法例的執行，亦有相當多的方式。顯然地，移民政策的收緊管制，已遠遠超出了綠皮書提出的各項，但我們很難估測政府的動機何在，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追認一下目前已實行的政策也說不定。

方：據陳君所說，綠皮書是一種長遠打算，作為長遠打算，當然有一套「哲學」背景，請問這套「哲學」是什麼呢？

陳：據官方的統計因為加國人口的自然增加率幾乎是零，所以人口增加的數目就決定於移民的人數，基於此，加拿大如果要制訂長遠的人口政策，就要注意到移民數量的問題？

葉：我想詢問一下新移民例的草案公佈了沒有？

胡：內閣（Cabinet）已定了，還未公佈。我看過部份，所有都跟我們呈上的唱對台戲（象笑）。至於你（指方）的問題，我須要先解釋一下。以我個人觀感，歸納成兩種意見，一種是大多數老一輩華人的看法，他們認為今日的管制，比起以前他們身受之苦，是微不足道的，何必斤斤計較呢？來則安之，如果我們爭取，必然引起猛烈的反撲，損失的畢竟還是我們華人。所以他們的態度都很審慎，希望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剛才你提及政府表現得虛偽，在他們看來，一切都虛偽，那也算不了什麼。至於另一種意見，大多數是較年輕的一輩，年長的當然也有。他們的看法大約分三方面。第一是無論如何要表達一下華人的態度，讓人知道華人在加拿大社會中雖屬小數，仍有不容忽視的力量，不管政府是否採納大會的意見，也要將這種態度擺明。第二是：目前對不同膚色的人種，有厚此薄彼的情形，例如從英倫來的與從加買加（Jamaica）來的待遇便不同。所以，在種族平等上，須要努力爭取。同時須要跟其他有色人種團結起來，才有足夠的力量，爭取共同的利益。可是大多數的中國人不想把事體攪大，更不想發展一種運動。第三種是：政府提倡多元文化，目的何在，我們不必細究，可能是用以緩和英語系與法語系間的衝突，我們應該藉著政府這種政策來提高自己的地位，跟白人平等。所以我們對政府要表示大力支持，俾使以後如果由保守黨執政時也不會被輕易地推翻。所以我們說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利用綠皮書或其他的途徑，我們都要突出華人在加拿大有其文化及表現。

方：葉律師有甚麼意見？

葉：一九四七年加拿大有個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華人要求取消這法案，我當時做書記：對這件事相當投入。當時我們提到了實際性（Practicality），具體地說，就是讓家人有團聚的機會（Family reunion），以後政府逐漸讓步。我覺得現在加國終止移民開放，加緊管制，是勢所難免。任何政黨執政，都會循此而行，一貫不變。綠皮書不過是探測一下民意的反映而已。因此我們要重實際，儘量爭取多些華人移民，因為我們華僑經濟發展，是須要相當多的人力，所謂「人多好辦事」。限制移民已無可避免，至於儘量讓多些人移居加拿大，仍賴乎

華僑旅行社

AA TRAVEL INDUSTRY

384 College St. Toronto, Ont. M5T 1S7

（樂都戲院右隣）

電話：九六七·四七七九

服務週到 價錢最平

廉價豪華旅遊團

本社代理各國簽證

學生回港特別優待

每日有機，來往多倫多、香港、

東南亞及世界各地

我們的努力。遊說議員（lobby）是方法之一。這是個很實際的做法，講得太理想——例如爭取平等，則殊無效果。這種做法如果說是自私，那末我們也可以說這個世界根本就是不公平，祇一些講求公道的人才蒙受損失。

胡：葉律師提及家庭團聚（Family reunion）是個很重要的一點，我們可以藉此向政府提出人道上的要求。但我們也要分析一下背景。目前的經濟和政治勢力集中在白人手中，而有色人種的人口在迅速地增長，這對他們具有相當大的威脅性；他們害怕一旦「平等」了，就會喪失目前的地位。葉律師提及要「自私些」，儘量爭取華人移民，問題是怎樣落實地去做。因為我們在政治上未有足夠的力量跟他們抗衡。但他們也有所顧忌，因為投票的不少是有色人種，不敢明目張胆地表示歧視，我們也可以執着這個弱點。我認為用不用遊說議員（lobby）沒有多大的分別。問題在乎大部份加拿大人的想法——當然我們不知道，或許他們不歡迎有色人種，所以如果我們在公眾（public）前過份要求，我們的情形就會像目前美國黑人一樣，釀成一種運動。招致了白人的顧忌。所以我們不要過於激烈，也不能過份堅持。不然，即使是較溫和的白人也會引起反感。

葉：我認為應先把力量集中在移民政策上。溫哥華開的大會牽涉了太多其他的問題。移民問題一解決，其他的也會迎刃而解了。

胡：另一點我要指出，可能跟葉律師的看法不同，也可能大家殊途而同歸。我認為在移民政策方面，政府早已

全盤定了，作為少數份子的我們是無可作為的。全加華人代表大會的意義，我認為主要是對華人作一個檢討，華人藉此也達到空前的團結。

方：這個組織在技術上可能有困難，例如經費和人們是否有足夠的興趣等等。

葉：說到團結，從華僑的歷史來看，中國人對外一向是相當團結的，內部不和並不影響到對外的一致性。

方：我的問題是：有時我們會感到「有心而無力」。

葉：關於「有心無力」，我認為應該「盡人事而順天命」。

胡：我也有點悲觀的看法。目前有個同業的聯會，上次溫哥華開大會時，他們曾非正式地開了一次會，我也有參加。他們對移民的看法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有人認為更多移民來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可能在其他行業上亦有類似的情形，所以並不是人人都願望有更多華人移入加拿大。新的華僑頗多挾了雄厚的資金，在經濟上將原有餐館商店的生意擠垮。這種怨言在溫哥華已有所聞，多倫多不久也會發生。

葉：這是少數人的意見，我剛才已講過對內和對外的不同，例如攪中文班，有人反對，又例如醫生不願意看到太多中國學生讀醫，「多個香台多隻鬼」，這些人祇顧目前，未把眼光放遠。這也很難怪。實際上，對外與對內的分別是很大的。

方：先一致抗日，再打內戰未遲（笑）。也許我們不要扯太遠，因為我們尚有其他問題考慮。

何：我有點意見想發表的。首先我覺得在討論移民時，無論是中國人，日本人或印第安人等等，都有一種前提（Premise），就是為本族人的利益打算。個別的努力，很容易被逐一地擊破。祇要「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大前提存有一天，就沒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們要在團結其他種族方面做功夫。問題是怎樣做，我覺得我們對其他種族應有一種親切感，讓他們知道華人的優點，和加拿大各族人共處。同時，我們要反對這種前提的成立。同行同業的競爭而引起的自衛心理，也會產生這前提，這種種社會矛盾，都是造成不能團結一致的因素。

葉：你說到各人先顧自己，那是中國人傳統的觀點：親親而仁民，仁民而後及物。

方：可能你（指何）將個別的內部的矛盾放到整體問題上，例如餐館行業相爭，並不涉及種族性，假設目前西餐館妨礙了營業，同樣的自衛心理也會產生。祇顧自己的利益，而不顧念到相互傾軋的本來都是自家人中國同胞。同時我們也難於進行說服的工作，此類矛盾是難於解決的。

何：我同意這種說法。目前的團結，是在政府的壓力前達到的。短暫間，我們團結一致，但從長遠看來，這種前提（指「人各為己」）是有很大的妨害。你們提及的許多是事實，但從長遠來說，也不是既定一成不變的。我覺得作長遠教育是不容忽視的。

胡：我認為這種矛盾（指「同行如敵國」）是沒辦法調和的，因為這涉及了生計大問題。並不能說大家都是華人，便會衷誠合作。說到團結，我們須要組織起華人社區，不單是顧到目前，同時考慮到長遠方面。我們正缺少這

些人出面。然而人才是有的。我們攬團結，不光是說說，而必須有個健全的組織，這個組織並不干預到個別的利益，而在考慮到整體共同利益時就發揮作用。這就是聯邦的概念（Federation concept）又如唐人街的餐館，缺乏同業工會的組織（Restaurant organization）。如果他們有這種組織，內部的糾紛可以在同業工會中得到自行解決，而不必牽涉其他的華僑。如果有了個規模大的組織，可以自上而下，協助組織這種同業工會。例如律師，醫生，大家在一起可以互相磋商，避免爭生意。大家聚在一起，這是很易辦到的。所以我們須要有個健全的和具代表性的組織，作為先決條件。

葉：我們應先把力量集中在目前的團結，考慮目前急切的問題，長遠的計劃可以按步就班地達到。

方：也許讓我們談談其他的問題。Mac Kenzie King 在一九四七年訂了長期移民計劃，其中一點提及移民的地位，說移民是特權而非「基本人權」，很多人接納這種說法。衆所周知，移民是沒有選舉權的。到底移民的地位怎樣的呢？享有的人權有多少？似乎未有明確的界定。譬如說移民參加罷工而觸及法例，就有被遞解出境之虞。我想大家討論一下移民的地位問題，這點似乎是受人忽視的。

陳：你所講的似乎是兩回事。你初初講的Mac Kenzie King說的移民是「特權」而非「基本人權」，那是很對的。現在世界上有那末多的國家，你想去那裏就去那裏，這行嗎？都是要通過移民申請的手續。所以移民一種「特權」，不是凡申請的都可以入境。而你說到的移民地位是另一回事了。

方：移民是「特權」而非「基本人權」，就隱涵了對移民地位的看法。

何：我也覺得是兩回事。

陳：那是兩回事。假如你是加拿大人要去香港，也要申請和登記的。

方：如果照你所說那是普遍接納的一種原則，又不過是你說的一套那末膚淺，又何必大做文章呢？

胡：你意思是說，移民應與公民有同等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

方（插入）：我並沒這樣說過，我祇不過是提出問題來讓大家討論一下。

胡：至於移民的地位，全世界都承認，移民的最終目的是成為公民，如果移民是為了搶生意，政府一定本着本國人的利益加以拒絕。所以移民跟公民是有一定的分別，有人歪曲說移民是二等公民。移民在權利上是差些，但是，五年後不是可以變成公民嗎？如果移民入境可以跟公民有同等的權利，例如收入有保障，我們幹了十年八年的，豈會甘心？所以這樣說法是很不公平的。至於兩者那一方面應有分別，那一方面應相同，那是相當微妙的。你應該提出一些實例，說明移民與公民之間不應該有而事實上有的大分別。我或者再提一提剛才說到的組織。如果我們遇上了這種情形，那時候我們可以藉這組織來遊說議員。但如果我們遊說議員，要求移民與公民相等，那政府會反對，我們作為公民的也要反感。

方：那末移民在人權上那方面可以作出要求呢？是否有明確的界定？

多倫多大學校議會上訴法庭在去年十二月中被取消方利平的上述請願。方某曾醫學院開除並被種族歧視問題。犧牲者，而「方某之被逐在其最後一年退學，仍因他能够力以畢業行醫。」巨大的遺憾是直到最後一年時，他的困難方顯著至逼使醫院下令他退學。

現年方年三十三歲的方亨利是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以八十九點一的十三級平均得分被多倫多大學醫學院取錄進醫學院預備班，而在一九七〇年九月順利地進入正式醫科，在正式

學子六年心血

在一九七〇年當他首次
醫科學生指多倫多

時，在最初的四個月，他的成績仍相當不錯，分數保持在七十至八十分之間。問題在他修家庭醫務科時發生，那科的導師當合醫學院院長，指他「不成實，不負責任」。

師在他背後寫了一封信給醫學院院長，持他一不滿意，不
實和無能力」，並要求校方把他開除。隨後方亨利再修了外
科及內科，當他開始修兒科的第一個星期時（一九七四年二

月)，他收到校方通知，說他因家鄉警務科，外科（只因舊式上的口試）和內科不及格而要退學。

「這次遭校方勒令退學經我本人進行上訴後，獲判得直

而彼被准重讀第四年。但同樣事情在七五年又再發生。亨利利對本報記者說。

「雖然我在一九七四年上訴得直，但醫學院某些希望限

刺華裔學生人數的陰謀者，並不想失去利用我來作例證的機會，以便壯大他們的聲勢，繼而向其他華裔科學生下手。在七五年，他再因外科考試不及格而遭校方勒令退學。

方亨利說他在一九七四年及七五年先後兩次遭大學醫學院逼令退學的事情，是不可以當作一件個別的事件來看。他

學子六年心血毀於一日

方亨利指出在他首次度內，外科不及格，及第二次利用外科失敗後，醫學院再度違反考試規則，剝奪了他可以利用不計分自選科的两个月，來補考試補修這些科目，因為兩次都是在最後時間，醫學院才通知他考試不及格。

在重讀第四年課程時，方亨利首先成功完成內科。但在

重傷外科師
他在口試時遭
導師難倒，他

多大學歧視華裔

對一個四年級學生是不應該用這樣困難的病症來作題目。方亨利並且指出一連兩年，他都沒有機會去修兒科，因

爲只要他兒科及格，校方要勒令他退學理由便弱了不少。他說有一點令他反感的是，當他在進行第二次上訴前，醫學院四年級的校務主任對他說：只要他願到香港或台灣。

去完成他的學業，校方將可給他一封「好的」推薦書，從這一點方亨利認為校方只是不欲他在多大畢業，而不是他的學科有問題。

一羣多倫多大學的華人學生對本報表示，他們希望廣大僑胞能支持方亨利，他們說：要求僑胞支持並非爲了方亨利被醫學院開余因剝視事件，而是因爲種族歧視的惡果，

將可能落在每一個僑胞的身上。

方亨利說：「我希望各位僑胞明白此事件的重要性，它不但可以影響我國人的前途，將來更可能影響到每一位華僑。」

「醫的華人子弟。」

【本報記者】

（至此已超出了預定時間，主席提出延長半小時，但大多數人須要離去，就此散會。）

方：也許讓我舉個確切的實例來講。據云有移民被移民特別調查官扣留，關在 Don Jail 或 Stethcore Hotel，甚至有被關上一年或兩年。該處官員有很大的權力，集指控、證人，陪審等等在一身，可以將移民當犯人一樣來審。

陳：你對這方面可能了解不夠。葉律師可能會了解些。我做翻譯的，去過幾次特別調查，照我所知道，移民犯了法，根據加拿大的移民法例，有被遞解出境的可能，因為身為移民特別調查，在法律上仍然未有加拿大居留藉。特別調查處拘留的不僅是移民。大多數是持有學生護照或旅行護照的人。有些人犯了法，例如高贖，就囚在那裏。據我所知，查詢的情形並不像審犯人一樣，但亦有欠公平的地方。因為那並不像打官司那樣，分控方、辯方等方面，但被調查的一方是有權請訴訟代理人。

葉：有學生因為高賣而被遞解出境？

陳：我見過有這樣的情形，但並沒有被遞解出境，而是在訴訟代理人的勸導下自動離境。

律師
去家
處簡
何訪
往走
育案
教法
文新
中民
洲移
美關
北有

聰律
家
簡
訪
走
案
法
新
民
移
關
有

師

冒小
感俠
性武
行談
流
型恨
豬張

說：
動
濟
經
街
人
唐

嘉年地產實業公司

及移民政策新方案的一些體會

· 水 ·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歷史性的「全加華人代表大會」揭幕了。一百二十多名各省代表，僑胞、和其他熱心人士，在溫哥華的洪門民治黨禮堂中，展開了為期三天的討論。討論內容包括：

- (一) 華人在加拿大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二) 加拿大移民政策；
- (三) 移民安置與輔導及福利；
- (四) 加拿大公民——移民在多元文化的社會；
- (五) 全加華人聯會性質的組織，是否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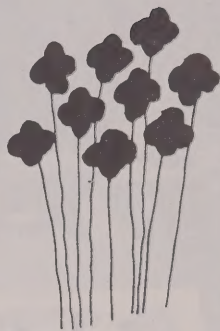
這幾天的程序，安排得十分緊湊，每天由上午九時開始，除了午飯、晚飯和短暫的休息之外，就是演講、分組討論、報告、綜合。筆者認為公開討論的時間非常不足。其中中英互譯原意雖好，却化費了不少時間。尤其不幸者，就是在一些無關重要的事，曾有人互相攻擊，妨礙了大會的進行，這使大會蒙受了污點。

會中最議論紛紛和爭持最烈的，莫過於「全加華人聯合總會」的提議。討論過程中，有人對中華會館目前的代表性和領導方針提出了質疑，又有人認為應改組中華會館，各省館址可改作華人聯會辦公地點。提議隨即激發了詞鋒尖銳的互相抨擊。大會主席也顯出有點手足無措。幸而有幾位代表，大力指出當前急務，是在加國華人利益的問題上找出適當的決議。政治思想和背景上的差異實不足以打碎華人間在這層面上的團結，大大打擊了「華人間歧見重重，沒有條件談團結」一類之論調。最後大會議決成立全加華人聯會，目的在於團結全加華人，為全僑福利服務。首先組成一全加華人機構籌備委員會，由各省代表選派三人共同負責籌備事宜，並推舉安省代表草擬章程。

大會中最動人和最啟發的演講就是蔣扶博士在八月廿九日晚的講話，他搜集了珍貴的幻燈片和編造了很多圖表，把華人在加拿大的辛酸史，描繪得淋漓盡致。他指出：由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二三年，共有八萬六千九百卅七華人入境，他們每人曾交五十元、一百元、或五百元的「人頭稅」不等。連本帶息，引伸到今日的貨幣，這個數目可不少，（況且道義上的債是不可以用金錢去度量的呢！）過去的事儘管不提，加拿大政府對華人實應承擔相當的責任和義務。

對「呈上國會的移民政策報告書」的一些看法，議論紛紜的緣皮書的目的，據說是在於激發全國性的討論。目前政府的「移民政策特別聯合委員會」(Special Joint 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Policy)已呈遞了一份報告書給國會。

這份報告書的論點還算是合理的。它指出了加拿大國內的人口流動是城市成長和擁擠現象的主因，也指出了移民比土生土長的加拿大人犯罪率低約百分之五十，承認了



移民對加國不僅不是負擔，且提供了經濟上、文化上、和社會質素上的貢獻。關於發展中國家「人才外流」的問題報告書也指出了是該由移民出口國自己負責解決，才不致造成歧視性的移民政策。尤其值得鼓舞的，是該委員會向國會提議採取法律上的行動及校內教育，以保護加拿大人民及移民免受歧視。本人就這個問題，曾在全加華人代表大會中及事後致函大會秘書，建議聯邦政府領導及支持省政府，實施一種消除種族間隔膜的校內教育方案。

報告書另一進步的方面是對獨立申請人較以前公平，尤其是工作經驗豐富而學校教育較少的申請人，將會比前取分稍多。沒有工作安排，但職業技能適應加拿大環境的也可以得到較多的分數。同時報告書也聽取了部分民衆的意見，表示移民辦事處的地理分佈該從新編排，以免產生既成的歧視現象。

令人失望的，可以見到有兩點：

第一、持學生簽證的，畢業後，仍須立刻返回本國，而不能在加拿大工作申請移民。在這方面，見得美國比加拿大來得更大方和關心學生。在美國，畢業的外國學生可工作一年半，以吸收工作經驗，名之為「實習期」。(Practical Training Period) 移民政策聯合委員會却認為，外國學生留加攻讀既然是一種國際間的協助，便有必要「鼓勵」學生畢業後回到本土去。

第二、委員會反對特別查詢官員 (Special Inquiry Officers)，應是人力移民部以外的獨立特派員，又反對所有外籍非移民人士皆有權對遞解出境的命令提出上訴的建議。認為這樣會費時失事，浪費公帑。鑑於近年來在報章上常有新聞反映人力移民部人員有濫用職權的情形，筆者對報否書這個看法，不免有點失望。

總括來說，報告書處理問題的態度，還算認真，至於將來政策的實行方面就需要我們拭目以待了。



你！投票的結果

ALLAN SPARROW
ALDERMAN

大多市兩年一度的市長及市議員競選在十二月六日平平淡淡地舉行了，大熱門人物均紛紛勝出，沒有什麼爆冷的情形出現，大多市的合法選民共有一百三十多萬人，而這次前往投票的只佔這數字的百分之卅，這比率不較七四年差，因為是年的比率亦只得百分之三十。

龔比 (David Crombie) 以壓倒性的姿態勝出，連任為多市市長，共得十一萬多票，接近所投總票數的百分之八十四，與他最接近的挑戰者 (共有九位) 為安德烈斯，只得七千餘票。多倫多市議會中的二十三席，只換上六名新人，而在五個市分區中，只有密士加區 (Mississauga) 選出新的分區市長，其他四個分區均有舊人連任。

在多倫多市的十一個區中，與華裔及華裔居民關係最密切的，要是第六區，因這區是新舊華埠的所在地。這區的市議員由鄧協 (Dan Heap) 及史巴勞 (A. Sparrow) 連任，挑戰者為畢彼德及連納斯基 (Peter Budd & A. Linetsky)。他們所得票數分別為：鄧協——八千四百餘票，史巴勞——七千九百餘票，畢彼德——四千四百餘票，連納斯基——二千餘票。

鄧協及史巴勞是靠他們在過去兩年的政績表現，而博取得選民的選票，他們在市議內屬「改革派」，而所謀的政策皆以勞苦大眾的福利為首要，這次向他們挑戰的兩人皆為商人，畢彼德是猶太裔富商，在第六區營商達卅多年，他的產業有不少是在這選區之內，在競選最熾烈時，他的聲勢一直凌駕在鄧協及史巴勞之上，畢氏的宣傳標板在選區內，四週可見，由此可知他為這次選舉所花的金錢實在不少，連納斯基的競選活動則沒有這麼勁。畢氏的生意

包括有彈子機中心而連氏的生意則包括有按摩院，這對他們競選實有反效果的作用。

競選活動於踏進十二月後便入高潮，畢彼德與鄧協及史巴勞的助選團互相指罵，支持者間更發生一次「人身衝突」而要鬧上法庭去，畢彼德暗指鄧協及史巴勞碌碌無能，而鄧協及史巴勞則指責畢氏為「開彈子機及黃色小電影店的老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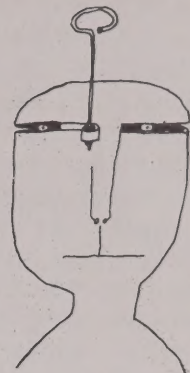
別一位受華人注意的市議員是第五區的華裔議員Ying Hope他以六千九百多票連任，較排第二位的菲殊 (Susan Fish) 多出一千八百多票。

本刊記者

鄧協
史巴勞

ALDERMEN		
Dan HEAP	Pressman	X
Allan SPARROW	Systems Analyst	X

加國 「兩種國家語文」 的 問題



· 於天 ·

目前在加拿大爭執得異常熾烈的問題，並不是魁北克省內獨立份子所鼓吹的魁北克獨立活動，更不是那老生常談的美國經濟壟斷，而是加拿大兩建國民族有關「兩種國家語文」的爭論，「兩種國家語文」（英語及法語）這個問題已不再是政黨間的政見不同了，因為執政的自由黨政府，在野的進步保守黨，及第三勢力的新民主黨，均直接或間接地支持聯邦政府以英法兩種語言為國家語文，及以英法兩種文化為加國主流文化的政策。

魁北克省的法語語系國民及加國其他九個省份內的英語語系國民彼此間存有極深的偏見，他們對聯邦政府的「兩種國家語文」政策多不願去作進一步的了解，頑固地各執己見，恐防對方的民族會有過份的要求，從而危害及其本身的語言及文化，超量的自保情緒及互相懷疑更加深了這兩個建國民族的成見。

「兩種國家語文，兩種主流文化」是自由黨的一主要政綱。但現在這個政黨已因如何實施「兩種國家語文」的方式而呈現分裂。首先是來自魁北克省的前環境部長向馬相的掛冠，他不滿聯邦政府語文政策的主要理由是因為他認為聯邦政府對保障法語地位方面未盡全力；繼之是來自緬尼托巴省的前國防部長占姆士·李察遜的公開辭職，他也是不滿聯邦政府的語文政策。在他的辭職公開信中，他說明他退出內閣主要是替英語系國民抱不平。他說聯邦政府的「兩種語文」政策越來越糟，及過份地遷就法語語系國民。在辭職公開信中，李察遜並沒有提出任何有助推行「兩種國家語文」政策的建議，他的辭職對聯邦政府於繼續執行這項政策實有極大的害處，因為他暗中擺明他是反對在英語語系省份中推行「兩種國家語文」政策的。

聯邦政府的「兩種國家語文」政策始定於自由黨上一任總理——皮雅遜的內閣，他所定下的「語言」原則與現時杜魯多內閣所執行的政策大部份相同，皮雅遜認為聯邦政府應該能以英及法語去為加國的兩大建國民族服務，而英法兩裔國民亦應有特權，可以只靠用其母語便可在聯邦

政府內工作。當時自由黨政府訂下「兩種國家語文」方案，主要是用來對抗六十年代中葉魁北克省內魁北克獨立運動情緒的高度發展。並向魁省的法裔國民表示在渥太華內，法裔國民是有其一定的地位。

這項草案到杜魯多在六八年上半年上台後，便更具規模，加國的聯邦政府「官方語文法例」是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正式生效，該法例給予英語及法語同等法律地位，而聯邦政府更利用官營的 CBC 在魁北克省以外，向法裔國民提供法語的電視及廣播節目，法例並規定所有在加國零售的製品必須附有英法兩種文字的標註及說明書。英法兩語系的國民並不因獲得「平等」待遇而結束紛爭，反之這問題變為在別一平面上的鬥爭。目前的情況是英語系的省份表面上是接納了聯邦政府的「兩種國家語文」政策，但除聯邦政府機構外，英語仍是英語省份內「非法定」的唯一官方語文，而在魁北克省內，省政府則法定了法語為唯一的官方語文。

自由黨在過去一直為「兩種國家語文」而苦戰，因為該黨希望這問題於解決後，便可從根源方面消除英語語系國民與法語語系國民的隔膜和敵視，該黨的工作在「官方語言法例」被通過後可算是實現了一半，但過去數年來的事實表現出，這「兩種國家語文」政策在實施方面，所遭遇上的困難一天比一天厲害，最主要是因英語語系省份的國民不願多用一種其不用而已可以自存的語言，而魁北克省則極力保護其法裔特色，恐防遭英裔特性所同化。

聯邦政府是在去年中，於規定魁北克省及渥太華首都地區的機場指揮塔控制人員，必須能用英法兩種語言作空中交通指導時，碰上最厲害的一次「反抗」，英語語系的指揮塔控制人員及飛機駕駛員強烈反對聯邦政府這項執行「兩種國家語文」措施，他們以這種方法有礙空中交通安全為理由怠工達一週，這項「安全」爭論現正由一特別研究組委員會所聆聽；指揮塔控制員及飛機駕駛員的行動直接引出目前的兩種國家語文爭論，而實可視為英語語系國

民對聯邦政府的語言政策的首次正面對抗。使用兩種語文作空中交通指揮是否真的有必要安全，這實在是極難確定的，因為世界各國許多地方的機場、指揮塔控制人員所用的語言往往是兩種（英語及其本國的語言）或兩種以上，但未見做成什麼「不安全」的地方。

有關聯邦政府推行「兩種國家語文」政策的進度，魁北克省的國民認為進展得過慢。而英語系省份的國民則認為這政策的速度簡直快至像把「法語硬性地塞進他們的喉裏」似的。筆者本人認為聯邦政府的速度確實畧為過急一點，而在執行時應更為著重在教育下一代方面，而不應急急地用法語速成法去訓練所有聯邦政府內的高級及中級官員，據悉這種訓練，每名受訓官員平均要耗用九千多元，法裔及法語系國民在加國畢竟也算是一小數民族（在二千二百五十萬國民中。佔五至六百萬人），而日常要用法語的地方也只限在魁省及省都地區。

英語語系省份的國民，特別是中部及西部英屬哥倫比亞省的，對法語系國民一向存有頗重的偏見，他們認為法裔國民於聯邦政府的「官方語文法例」被通過後，理應心滿意足，既然法語已獲得合法的地位，他們實不應再有什麼爭取了。但英語語系國民並沒有注意到於「官方語文法例」被通過後的五年多來，英法兩種語文一直只能在聯邦政府機構內獲得同等地位，在各省府方面而言，一切情況與五年前於未通過該法例時仍是一般。用英文為官方語文的省份，照常使用英文，而以法文為獨尊語文的魁北克省，因看到這個情況而變本加厲地維護法文。

加拿大的歷史指出自在一八六七年立國以來，法裔國民一直在爭取法文的法定地位，於經過百多年輾轉週旋後，到一九六九年時才得到一點成績，法裔人士是不會輕易放棄其現已穩握的成果，他們自保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魁北克極力維護法語及法裔文化，是也許有其道理，一是因為聯邦政府雖然已公認英法兩語有同等地位，但聯邦政府內的法裔高級官員在過去五年多來却未見增加，二是因為外來移民日多，而新來的移民多選擇英語為其子女所學的語言，這樣直接及間接地做法語語系國民總數將會日漸下降，在魁省法語語系居民比率下降得最厲害的為首府蒙特利爾，可能為了這兩原因魁省政府及一些法裔人士的大機構，更加着重其「自保」工作，在他們的組織內極力排擠不諳法語的人士。

據一項數字指出，從一八七一至一九五一的八十年間，說法語的加國國民佔據全國人口的百份之卅，目前其比率只佔百分之廿八，估計到二〇〇〇年時，法語語系國民將只佔全國總人數的百分之廿三，在一九七一年時，法語語系居民佔了蒙特利爾的總人口百分之六十六，而估計到二〇〇〇年時，將只佔百分之五十九，魁省的法裔領導階層只能明知其人口比率將日弱於一日。所以力圖於現在以強硬立場盡力保障法語及法裔文化，該省的「語言法例」（第廿二項法案）內有一項是規定所有新移民的子弟，如其母語不是英語的話，皆必需通過一項語文測驗才可以進入該省的英文學校攻讀，否則必需到法語學校去，這規定明顯是希望維持該省法語語系的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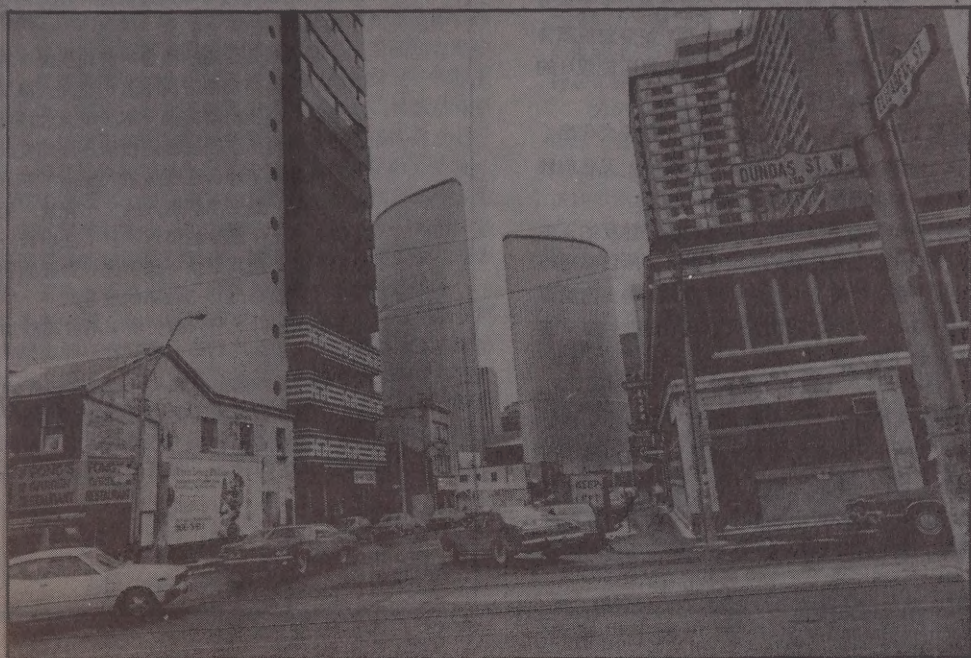
這項「語文測驗」規定，已遭魁省新移民一致聯合反對；同時，魁省公開採取的「一種官方語文」態度亦普遍並引起英語語系國民的不滿，中部省份有不少人提出為什麼聯邦政府要花用這麼多金錢及時間在執行「兩種國家語文」的政策上？反正魁北克只是一個省，如它要分立獨立，便隨它去吧，除該省外，加國還有別九個省份嘛，更有人客觀性地勸導法裔居民不要意為在獨立後，便可以不再用英文，反之於獨立後，他們會變為更需要使用英文，因為屆時「魁北克國」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及加拿大，均是使用英文的國家。

加國總理杜魯多是支持以英語及法語為國家語文最力的人；將魁北克省保留在加國聯邦政府內是他在一九六八年競選總理時的主要政綱之一，當杜魯多的多年老朋友兼老同志——尚·馬相（前環境部長），因不滿聯邦政府不按執行「兩種國家語文」方針，而強逼魁省反渥太華首府附近機場的指揮塔人員，兼用法語去作空中交通指導，而憤然辭職時，聯邦政府的語言政策首次出現分裂，於事隔數月後，前國防部長李察遜（代表著部份英裔國民的立場）於十月間的亦作類似「抗議」。這兩次事情對聯邦政府的語言政策，是極具衝擊力，幸好杜魯多本人及其他內閣部長仍深信「兩種國家語文」政策是加拿大必需的。而繼續向困難重重的前路邁進。

杜魯多曾一再強調：如能執行兩種語文政策，便可以確保加國，否則只有做成國家分裂。他說：「當魁北克省表示該省只願用法語，而任由其他地方使用英語時，我說那一刻便是這個國家完蛋之時，如魁省居民不明白具有兩種國家語言，對其是一種富足，及能與祖國作更緊密的連繫，這實難使沙斯卡頓（薩克其萬省的一都市）及維多利亞市（英屬哥倫比亞省的一都市）的居民明白『兩種國家語文』」是一件好事。」

當聯邦政府與加國十個省份的首長於一九七一年在維多利亞市開會，討論如何將加國憲法從英國國會中移回加國的問題時，各省省長對把「英法兩種國家語文」的一項法例加進加國憲法內的提議，不能達到一致的決定。魁北克省更於稍後時間，不理會已通過的聯邦政府官方語文法例，在其省議會內通過第廿二項法例（一九七四），即是那以法文為該省唯一法定語文的法例，在英國之北美法例（一八六七）——即加拿大聯邦政府成立的法例——中，具有明文規定，魁北克省在省政方面是可有其獨特的法裔色彩的，而聯邦政府一方面礙於英國北美法例對魁省的保障條文，而另一方面則由於不能干預地方政府的施政，所以現在沒魁省奈何，只能勸導其放棄以法文為獨尊語文的政策。

總而言之，加國英法兩裔國民的「兩種國家語文」爭論，勢將會繼續一段時期，如雙方的態度不變，或會永遠地繼續下去，成為加拿大的一個瘡疤，一個因動美容手術企圖填補裂痕而留下的瘡疤。



唐人街經濟動態

去年十一月上旬，我們分別訪問了華商會的周樹鎬先生和詹德團先生。周氏和詹氏都在加拿大生活多年，對華埠的經濟和社區生活，認識和感受頗深。

周先生認為，多倫多的華埠之所以有今日的繁盛和地位，是很多熱心華埠發展的人辛苦經營的結果。遠至十年前，因大會堂籌建事，華埠的存在本身也起了疑問，若干熱心人仕便組成了「保留華埠委員會」，此即為華商會的前身。華商會早期成員僅得十多戶。一九七四年後才增至八十多戶。目前成員約二百戶，包括了飲食業、地產業、零售業、銀行業、保險業、出版業、及會計、牙醫、醫生、律師、則師等各行業。近年來成員增長的原因，主要是華人移民及華資流入所致，而不是華人對參與活動的興趣的提高。華人傳統的「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態度仍十分普遍。商人如是、工人如是。加拿大華人的工會活動，遠比其他加拿大人為低。周氏只知道一個華人工會，就是車衣行業的。

據周氏透露，華商會的宗旨有五點：

- (一) 發展華區貿易和業務。
- (二) 增進華區福利事業。
- (三) 增長不同行業之間的了解和合作，促進華

商人之團結。

- (四) 促進本地及海外華商之聯絡。
- (五) 留意政府動向，以中文傳譯儘早通知會員政府政策之變動，以及有關法例。

這五項目的的實現對多市整體華人的利益關係至大。因為華人在華資機構就業的實在很多。可惜華商會還未能取得足夠的支持去爭取更大的成果。周氏認華人中，背景的迥異、黨派的分裂、及對本地問題的冷漠是華埠進步的極大障礙。部分人仕，只會批評，不會建議，在關係華埠利益的集會中接到了邀請也不出席，無形中削弱了華人對權益爭取的力量。

去年內實際的工作成果有：

- (一) 在華埠設立更多的泊車位，方便上落。
- (二) 在週年晚會上，請到了國會議員李橋棟先生講解移民綠皮書。商會並派代表參加移民政策行動委員會，對移民法例的修訂提出意見。
- (三) 在華商會爭取之下，多倫多市市長宣佈農曆新年為多市春節。
- (四) 在華埠四周的街道，見到的中文路牌，也

採訪多倫多華商會簡報

是華商會奔走爭取得來的結果，此等路牌，將擴展到東面的大會堂附近。

(五) 省政府訂立的假日休業法例，影響華區商號營業，商會請到了省議員高士文先生及金寶夫人為會員講解法例，並發起請願書簽名運動，要求准許華區零售店於假日的僱員人數增至六人。

(六) 贊助多市多元文化運動的國際文化節 (Caravan)，推出「廣州館」。又曾放映從中國使館借來的電影。

展望將來，周氏覺得華裔商人中，抱觀望態度的人多，做事的人少，熱心社會公益的仍是小數人，所以募捐時慷慨解囊的人不多；有事發生了，要商量對策時出席開會的人數並不理想。所以，要華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每個華人須多貢獻一點力量。

× × ×

在銀行界服務的詹先生，指出最近三、四年間，華人資金大量湧入加拿大，為前所未有。此等資金來自很多國家，包括香港、台灣、中美洲和南美洲、星加坡、美國等地，而以香港為最特出的資金來源地。投資的對象以地產為主，飲食業次之。投資地產的，多以高層寓所樓房居多

，雖然投資於商業樓宇的也有。

貸款經營的，以飲食業為主。因經營地產業而貸款的，數字很大，但客戶較少。私人貸款的，則多是為了購置住宅。貸款量以今年為最低點，明年可望稍為好轉，但仍不樂觀。

問及華人從商的機會，詹先生說，若是自己經營的，困難在於客路聯絡方面；若是在別人機構任職的，困難往往也是人事上聯絡方面。不少華人在語言溝通方面，仍有問題，這包括了語言表達技術方面和交談內容方面的局限。華人必須了解自己在加拿大生活，在身份上就是加拿大人，主動一點去了解別人的文化背景。通常來說，在中級經理級以下，歧視的情形不多；在中級經理級以上，受到壓抑的情形較為嚴重。通常同等資歷的要競爭一高級職位時，華人比 Anglo-Saxon 的機會低。

詹氏估計，華人的失業率不會高於加拿大的平均數字。

詹氏為華商會司庫，對華商會担任的角色，認為應是政治的。華商會有潛力成為一股有力的政治力量，代表華人去爭取應得權益。

INTERNATIONAL CHINESE RESTAURANT

國際大酒樓

Tel: 363.1391

二樓龍鳳大堂
貴賓廳房

重金禮聘四人大樂隊
伴奏晚飯餐舞
大酒樓氣派
大眾化價錢

營業時間
晨早九時至午夜一時

龍船酒吧

別創風格
情調新穎



六大信譽保證
選製價裝衛服
料作格置生務
上精公華清忠
乘良道麗潔誠

特價翅席 由一百元起
豐儉隨意 歡迎訂座

三樓畫廊大廳
晚飯餐舞

加拿大安省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四二一至四二九號

前言

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學說，包括了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大綱領。這三個綱領統括了一切理想社會中的內容。民族主義是爲了擺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奴役和控制，保障國家在政治上的自主、經濟上的自立，和領土上的完整。民權主義就是政治上和經濟上，人民應享有平等權利。民生主義是通過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確立而行使的，內容是國家對民生所負的責任，包括鼓勵、幫助、督促和管制等等，減少貧富的差距，使國民都得到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地步。「衣食足則知榮辱」，一個國家無論發展科學或推動文化事業，都宜在人民不愁衣食的起碼條件下實行，不然則成了少數人的專利品或者侈品。

本報叫做「民生與經濟」，目的是介紹一些幫助我們改善民生的經濟常識。在內容上包含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社區、國家、以至於國際間的經濟動態的報導；各種經濟系統和經濟政策的分析等。希望通過這些討論，我們的眼光能放得更遠更大，不拘執於眼前的個別蠅頭小利，而爲更長遠更多人作打算，以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

第一章 價格的功能

在現實社會裏，一切消費品都標有價格。通過市場的媒介，消費者以金錢換取所需的物品。這種交易的方式，無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社會都具有，只有在構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才不出現。

有人說：價格、市場、金錢，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是資本金剝削人民大眾、互相爭權奪利、向外擴張掠奪的工具，都是腐朽不潔、不應存在的。這話有道理嗎？

怎樣的社會才沒有價格、市場和金錢？

答案有二：（一）是原始社會。原始社會的交易方式是以物易物，仍未發明貨幣來方便貨品的流通。這個時候，沒有金錢，自然也沒有「金錢至上」、「金錢掛帥」、「拜金主義」等情形，更沒有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這類東西。（二）是構思中的理想共產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生產力已「徹底解放」，人民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那時既然物資十分豐裕，一切欺騙、偷竊、搶劫都無須出現。因爲每人既可得到一切物質上的需求，而且這時的人都是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的，利益上的衝突也就完全消失。

我想指出的是，現實社會並不是滯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時代，也沒有達到了那引人入勝的理想共產主義社會。我們應做的不是等待那理想社會的實現，而是在現實社會中，體察現實的人性和環境的局限，踏實地的進行改革的工作，爭取人人機會均等和生活上的改善。

在現實的社會中，金錢帶給我們很大的方便。例如，我們有意出讓一架車的時候，用不着傷腦筋換取什麼適用的東西。我們可以將賣了車所得的錢靈活地運用。原始社會的人們在物品交易時，一方面要互相同時對對方出讓的物品有所需要，另一方面因爲物價價值不同而須用別種物品以作爲找贖之用，這樣做諸多不便，又由於沒有明確的價格作標準，不公平的現象時有發生。

價格是怎樣的制定的呢？如何制定才能滿足大多數人的要求？

爲簡單起見，首先讓我們假設某國祇有十個人，各人的購買力相同；每人每月會購入一百元的貨品。又假設市面上只有兩種貨品，就是牛肉和蔬菜。那麼，不管牛肉和蔬菜的供應量如何，總值必然是一千元。假如某個月內市面供應了二百磅牛肉和三百磅蔬菜，那末，每磅牛肉和每磅蔬菜的價格應若干呢？

這要視乎較喜歡吃牛肉的人多還是歡喜吃蔬菜的人多而定，譬如大部份的人都喜歡吃肉，全國花在牛肉的消費量（Spending）是八百元，花在蔬菜上是二百元。那末牛肉的價格就自動調整到四元一磅（ $800 \div 400 = \$4$ ），而蔬菜的價格則是二元三磅（ $200 \div 300 = \$2/3$ ）。要多買一磅牛肉，就得付出四元的代價，即少買六磅的蔬菜（ $4 \div 2/3 = 6$ ）。不是對牛肉特別喜歡的人就不會多買牛肉。按供求關係制定的價格的結果是，牛肉的消耗將會以那些最喜歡牛肉的人爲主。

如果較多人喜歡吃菜的話，情形就不同了。假如全國耗在蔬菜上的費用總值是六百元，而花在牛肉上的費用是四百元的話，蔬菜每磅將調整至二元（ $600 \div 300 = \$2$ ），牛肉亦是（ $400 \div 200 = \$2$ ）。多買一磅牛肉只須付出一磅蔬菜的價錢。較喜歡吃牛肉的人將可多買一點牛肉。

（即少買一點菜），這樣，較喜歡吃菜的人便可多買一點菜。彼此各得其所。

所以，在供求關係下產生出來的價格，實際上顯示了該貨品對人們的「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無論多買或少買的人，最後購入那一磅肉所產生的效用價值，必定會超過這磅肉的價格。每個購物的人，當他付出該貨品的價錢的時候，也因少買了同等價值的其他貨品，在利益上不能侵犯別人。

以上是價格對已制成品分配到消費者所產生的功能。

此外，在購買力均等的情形下，價格還有兩種作用：一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一是對生產力分配的調節。

除了制成品外，生產資料也是標有價格的，倘若這價格也是由供應關係決定，則這價格在一般情況下將顯示出該生產資料的社會代價（Social Cost）。通常，每一工廠或生產單位是會設法減低製作成本的，不同的生產資料價格會導致不同的制作過程，因而影響生產資料的分配。舉一個例，如果塑膠原料的價格升高了，塑膠成品的產量將會減少，若干產品的製作過程中將以玻璃或其他代用品來代替塑膠原料，它的價格應該相當的高，因爲如果過低的話，它便可能被應用到一些較不重要的產品上去，因此，我們可以下這樣的結論：生產資料的價格，通過生產成本的關係，影響資源的分配和生產方法。正確的生產資料價格提高了生產力；錯誤的生產資料價格減低了生產力。供求關係制定的生產資料價格是最合理的，因它一方面反映了社會上各產業部門對它所願付出的價錢。

最後要談的價格功能是關於生產力的分配。再舉先前論及的例子。牛肉和蔬菜的需求量並非永恆不變的，當國內人民對蔬菜需求量確實增加了的時候，生產力的分配應該有所反應，比方把部份牧牛地改作種菜之用。按照供求關係的運用，當蔬菜的價格升高的時候，蔬菜作業者的入息也提高了，人力和資源的分配將相對地轉移到蔬菜的生產上去。

在現實的社會裏，由於各人購買力的懸殊，上述這三

種價格的功能都遭破壞，且產生了兩種反作用：（一）購買力強的可以購入大量的物品，而購買力弱的却可能連維持生活的基本需求亦達不到。有些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對日常生活必需品實行配給的制度。在購買力均等的情形下，配給制是沒有必要的，因為供求關係會自動地調節價格，這在作用上，跟平均分配是一樣的。（二）購買力強的利用他們的購買力改變生產力的分配，也符合他們對產品的要求。在貧富懸殊的情形下，「利潤掛帥」的生產，罔顧吃不飽、穿不暖的窮人的要求，造出了大量的奢侈品。

一般人的購買力是用勞力換取的報酬。假若購買力跟個人的生產力成正比例，即是個人不佔取多於自己的生產值的購買力的時候，購買力的不同並不表示不公平的現象。但是目前的資本主義社會裏，購買力跟生產值的脫節做成了一些人坐享他人勞動生產成果的情形。此外，一些特權份子和他們的子女得到了別人所沒有的教育和發展的機會。這些現象都可以號之為剝削——包括主動和非主動的剝削，關於剝削這概念，牽涉甚廣，容後再談。

（待續）

海外述林

一份大眾的刊物

徵稿啟事

- （一）本刊為一公開園地，歡迎各地讀者來稿。
- （二）本刊選稿的原則：凡不作人身攻訐的文章均一律歡迎。
- （三）來稿請以原稿紙書寫，切勿一紙兩面；除專題特約稿外，以不超過三千字為佳。來稿請附上真實姓名和地址，惟可用筆名發表。文章不願刪改請註明；如欲退稿請附上回郵信封。
- （四）本刊因經濟關係，暫不設稿費，來稿一經刊載，即致送該期本刊三份。
- （五）來稿請寄

P. O. Box 53
STATION P.
TORONTO,
ONTARIO,
CANADA.



思雅書舍

偉大的道路（朱德傳，史沫特萊著／七十年代雜誌社）	5.20
蔣經國傳（丁依著／文藝書屋）	2.90
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七年／據日本小倉編集）	9.00
中國共產黨三十年（胡喬木著／人民出版社）	2.20
毛澤東思想論稿（雙山著／信達出版社）	20.00
文革始末（上下二卷／司馬長風著／百葉書舍）	5.80
中國通史（上下兩冊／呂思勉著／香港上海印書館）	5.25
台灣歷史札記（吳法著／七十年代雜誌社）	2.75
秦淮感舊錄（一、二集／曹聚仁著／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5.80
中國民族簡史（呂振羽著／三聯書店）	2.95
中國現代革命史（何幹之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7.00
中國哲學史論文初、二集（馮友蘭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8.00
新譯老子讀本（余培林註譯／三民書局）	1.65
中國學術家列傳（楊蔭深編／香港文淵書店）	3.80
核武器和核戰（梁國著／集思圖書公司）	1.00
香港毒品泛濫真相（章盛著／七十年代雜誌社）	2.00
香港監獄生活真相（章盛著／七十年代雜誌社）	1.60
台獨真相（劉添財著／文藝書屋）	2.40
陳映真選集（劉紹光編／小草出版社）	2.75
台北人（白先勇著／晨鐘出版社）	2.75
莎啞哪啞·再見（黃春明著／遠景圖書公司）	2.60
圍城（錢鍾書著／小草出版社）	2.75
旅人的故事（鍾梅音著／小草出版社）	2.95
中英對照看圖識字卡（三輯／新雅兒童教育出版社）	1.90
幼童啟蒙卡片（新雅兒童教育出版片社）	2.10
中國家庭食譜（中英對照／萬里書店）	3.60
吳清源圍棋全集（吳清源著／香港知識出版社）	14.20
世界電影藝術史（喬治·薩杜爾著／宏圖出版社）	12.00
攝影取景技巧（麥烽著／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1.90
廣東筵席大菜（關淑仁編著／香港萬里書店）	3.90
彩色釣針編織圖譜（梁敏珊編著／香港萬里書店）	3.00
實用女服裁剪技法（文欣編／香港萬里書店）	2.50
兒童藝術歌曲集（黃友棣作曲／三民書局）	2.50
怎樣彈琵琶（凌飛熊，周潤華編／香港信成書局）	3.90
二胡講座（張晉召編著／香港信成書局）	3.50
倡和集（Singalong）（倡和集編輯委員會）	3.75

專營各類中文書籍及英文版亞洲書籍

（英文書部籌辦中）

歷史	文學	政治	哲學	經濟	科技
藝術	語言	字典	字帖	音樂	樂譜
食譜	棋譜	國畫用具	兒童讀物	醫藥衛生	

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二〇五號二樓

QUEBEC: WHAT NEXT?

魁北克省……魁北克國

由魁北克省法裔獨立運動份子所策動的脫離加拿大聯邦政府活動，幾乎是始於加國開始自治的時候；這有百多年歷史的「鬥爭」，在以獨立為首要政綱的魁北克人黨於去年十一月十五日贏得魁省大選後，踏進別一階段。

魁北克省獨立的爭論及有關的活動，一向是加拿大聯邦政府及國民的暗病，除了支持這「運動」的人士，及一部份聯邦政府官員外，其他一切人等均避免正面及有理智的研究這事情，總理杜魯多曾一再表示加拿大是不可分割的，加國的存亡實有賴加國能否避免魁省脫離而獨立，因為如魁省獨立成功，其他西部省份亦會效法，這樣加拿大便会完全分裂。

去年魁省居民拋棄自由黨而擁護魁北克人黨，是否表示他們已願意放棄聯邦政府的政體而接納獨立的理論呢？加國官方的解釋是：這次魁北克人黨的當選只是反映出該省居民不滿曾執政六年的魁省自由黨內閣，而希望更改執政的政黨；他們的決定並不表示他們接納新省政府的獨立政綱，這解釋可算頗為合理。

魁北克人黨黨魁雷域克（R. Levespue）於當選後亦承認：魁省居民目前可能尚未接受其政黨的獨立政綱，但魁北克黨將會盡力說服他們，並將於十八個月至兩年間舉行一次全民投票。以採取居民對獨立問題的意向，雷域克在競選時曾表示：只要他的政黨繼續執政，這種全民投票的測取民意方法將會不斷的舉行，直至魁省的大部份居民皆選擇獨立自決為止；這個政黨的首要目的是使魁省能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在未自立門戶之先，雷域克曾是魁省自由黨內閣的一名極為活躍及激進的部長，他一心一意為實現魁省能脫離加國聯邦政府而工作，這使他與魁省自由黨當權者不和，他們各執不可妥協的立場。在一九六八年，雷域克終於與若干比較激進的份子組成了魁北克人黨。

該黨在一九七〇年首次參加大選，但於是年若干分離份子亦在蒙特利爾市策動騷動；魁北克人黨是在是次競選有直接的不良影響，該黨受歡迎的程度在那次大選中雖略有

增加，但其在省議會上的席位只得六席，比七〇年還少一席。

在去年十一月的大選中，雷域克改變口號「輕化」其獨立政綱，表示在其當選後，將以全民投票方式來讓該省的居民自決其前途，這戰畧加上魁省居民對自由黨貝拉薩（R. Bourassa）內閣的厭惡，及雷域克受廣大工人的支持，終於做成魁北克人黨的勝利，寫下了加國歷史新的一頁。

以下的一些投票資料可幫助了解魁省居民對該黨的態度，其對該黨的擁護按着七〇、七三及七六年的大選而改變。

一九七〇年

自由黨獲總票數百分之四十五	取得七十二議席
魁北克人黨獲總票數百分之廿三	取得七議席

一九七三年

自由黨獲總票數百分之五十五	取得一〇二議席
魁北克人黨獲總票數百分之卅	取得六議席

一九七六年

自由黨獲總票數百分之卅四	取得廿八議席
魁北克人黨獲總票數百分之四十一	取得六十九議席

該黨這次獲選不但出乎加國聯邦政府上下人士的意料之外，也出乎該黨本身估計之外。在選前的一般預測皆認為自由黨在國會的席位將勢必大幅度下跌，但仍會獲足夠領先席位與第三勢力的國民聯合黨合組政府。投票的結果顯示出貝拉薩內閣的不得民心程度，較一般估計為高，但若干不願魁省獨立但又投了魁北克人黨票的，對於當前所面對的現實均感到心焦的居民，雷域克可能亦察覺到他們的情緒，所以他一再表示其政府在未贏得那次是否選擇獨立的全民投票之前，是不會一意孤行地去發展脫離聯邦政府的安排的。

如去年十一月投票支持魁北克人黨的人士，皆是支該黨的獨立政綱的話，該黨也只得總票數的百分之四十一，而未得大部份票數，反之投票支持以留在聯邦政府內為首



雷域克 Lévesque

要政綱的自由黨及國民聯合黨的居民，則共佔總投票額的百分之五十二。況且這次支持魁北克人黨的人士不一定是支持獨立運動的，根據CBS國營廣播機構的一項民意測驗，在魁北克人黨未當選前，其支持者中有百分之六十是擁護該黨獨立自決政綱的。但在該黨獲選後，及該政綱可能會成事實的陰影下，魁北克人黨的支持者則一轉而有百分之六十是反對獨立運動的。

真正的民意是否希望獨立，這問題在年半至兩年間，將可以獲得答案。現在回頭談談那遭受重大挫折的魁省自由黨，貝拉薩內閣的任期本來是要到一九七七年年底才完結，而他這次在任期未滿前舉行大選，主要是他自視過高，在別一方面是他希望在其勢力基層，還未因他的內閣無能而完全崩潰之前，及乘去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能成功地演出的「餘威」下，進行那次大選，希望可「博」得另四年任期。在競選時，他盡量避免談及其政府的一連串無能及貪污醜聞，魁省居民今年要面對的十億元赤字及高達百分之十點一的失業率。但這些事實魁省居民是不會視若無睹的。

貝拉薩是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廿七日獲選為魁省自由黨的黨魁，而在同年的大選中獲選為魁省的首長。他的內閣在七〇年及七三年的勝利主要是獲得聯邦自由黨政府的大力支持，其支持者包括過半的魁省居民，特別是不屬法語語系的小數民族，他們皆恐防讓魁北克人黨勝利後，會硬性將魁省從加拿大分割出去。在七三年大選後，貝拉薩內閣可算處於穩握大權的黃金時代，但在七四年貝拉薩打擊魁北克人黨的一項有力政綱——保全法語在魁省內的特權，急急通過那項所謂法語獨尊法例（第廿二項法案），使魁省成為加國內，唯一明文規定使用一種語言為法定語言的省份。這法例不但有違聯邦政府的兩種國家語文政策

（詳細情形可參考本刊別一文章），同時也激怒了曾投票支持該黨的小數民族選民，因該法例直接影響他們下一代的教育。

在執政的六年間，特別是最後的三年，自由黨的政策及行政人員的腐敗使選民大為失望，而在十一月的競選中，該黨所提出的口號更帶有極大的威脅性，表示只有貝拉薩才可避免分離主義。但對解決該省失業及勞工糾紛問題則含糊糊地不作正面的承諾，在別一方面，當時在野的魁北克人黨的競選口號則極具改進意味——「我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政府」，同時，該黨對拉平貧富懸殊及削減失業率的政綱，對魁省的居民而言，頗具吸引力；魁北克人黨在獨立政綱方面亦給予魁省居民一個選擇的機會——全民投票，該黨所提出的都比自由黨的手法來得較為容易接受。

目前魁北克的執政黨是一個鼓吹脫離加拿大而獨立的黨派，是一千真萬確的事實，這不是雷域克一個人的運動，他的手下所採的步驟可能會較他更為激進，目前要看的是聯邦政府如何有理智地去拆除這個「危機」的導火線。

加國總理杜魯多在魁北克人黨贏得大選後，曾在全國作了一次公開演說，他表示在面對該黨的勝利，加國國民不能再把魁北克這個問題押後由下一代的加拿大國民去處理，這是真實而屬於現在的危機，而其挑戰性是極為逼切的，唯有當加國國民皆希望一個文明社會中，共同生活才可以確保這個國家可繼續團結下去。

他表示雷域克這次當選並未得到該省居民一致同意，他將魁省從加國中分割出去，而他將不會與魁北克人黨討論任何有關該省脫離聯邦政府的憲法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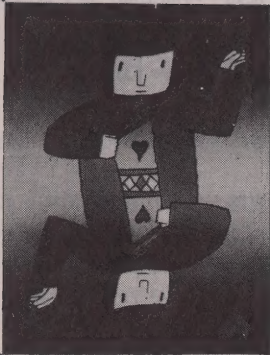
加國三個主要在野黨——進步保守黨，新民主黨及社會信託黨，皆乘這個時機向執政自由黨政府攻擊，他們皆批評聯邦政府過份集中權力及不能理智地處理魁省問題，但他們對「加國是不可分割」的目標則與自由黨內閣是意見一致的。

在較早時杜魯多曾一再指出：加國聯邦政府將不會用武力來把魁省留下的，而別一名政府高級官員則表示：如魁省真的達致要獨立時的局面，聯邦政府將會按和平談判方式與該省執政黨磋商有關憲法上的修訂及責任上的分担問題，勢必要花上十年的時間才可完成。

在該次全國廣播中，杜魯多謂：「我認識雷域克多年，有廿年了，我與他若干同胞亦頗為諳熟，對他們的才智及決心我極為尊敬，我們皆深信平等，我們皆希望本國國民有自由、平等及民主，但我們對實施時所用的手段問題，所持的意見大不相同。我與雷域克的意見分歧始於十年多前，這由於我深切相信加國內有足夠空間可包容所有加拿大人，而他則——可能已有點後悔及懷有悲傷的心情——持相反的意見，所以他團結了若干精忠的死硬派，而與一個好鄰居的語氣與加國其他地方對話。」

杜魯多指出加國自創國至今皆本着結合英法兩文化為主流，加插其他文化在其間而使之更飽滿，如現在頓時放棄過往的一切，這不但有違原有精神的一種罪過，且是危害人道的一種罪過。

四度時空：



四個年青人
在四個空間裡
的
不同
思想和感受。

「三等公民」和溫健騷的道路

向東

已故的溫健騷先生曾經提及所謂「留學三部曲」，其中的第三部，便是留學生成為「三等公民」。

健騷先生早年留學美國，後來因不屑作「三等公民」，終於回到香港去了。他的高尚情操和晚年對文藝界的貢獻，尤其是喚起海外同胞對祖國的認識和對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鬥爭，是每一個海外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的。

海外知識份子經過釣魚台運動後，政治意識普遍提高，其中比較先進的一部份，更在運動的實踐過程當中，由感性認識進入理性認識，由運動初的純「民族主義」提升到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批判……。

「留學三部曲」的揭發和批評，無疑是海外知識份子醒覺的反映。溫健騷和不少海外知識份子寧棄安樂窩，不願做「三等公民」，究竟解決了問題沒有呢？

事實却是，回到香港也好，留在美加也好，仍是三等公民！歸根到底，最重要的仍是：醒覺了的海外知識份子，是應該投入社會的進步力量，去為推翻反動吃人的制度而鬥爭呢？還是甘心做三等公民？

溫健騷拋棄了北美洲的「繁華富貴」，終其生為香港中國人的解放而鬥爭。他其實應該也知到，北美洲的中國人，亦需要溫健騷之類的先鋒份子，去領導他們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的！

北美洲進步的中國人有一種普遍心理，便是不回港、台，便不能「革命」。其實北美華人社會需要革命的地方，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和剝削壓迫，並不比港台的同胞少，為甚麼先進的華人（尤其是那些入了籍的和移民）不能夠在這裏做一些有利人民的事業呢？

「三等公民」是一個社會事實，是逃不掉的。染黃頭髮隆高鼻子固然不是辦法，一飛衝天逃之夭夭也沒有解決

問題！這一個現象，是要通過社會鬥爭來解決的。

健騷先生選擇了殖民地香港為戰場繼續戰鬥下去，那是比我們一些自命「進步愛國份子」勝得多了！北美洲的一部份華人知識份子，畢了業，辦了居留，入了籍（「三部曲」完結了），之後就是只懂得在小圈子裏「認同」社會主義祖國，對於當前華人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却絕口不提不理，這算是怎樣的「進步」？

「一個真正的革命份子，無論身在那裏，都是一無所忌的」。美加的進步華人，就抱着溫健騷的精神，去開展他沒有開展的事業吧！

無題 金帛

午夜醒來，時鐘的聲音，像小精靈，輕快地在書架上跳躍着。睜開眼，四週都被書本圍攏起來，那麼不經意，但又不不太凌亂的堆置在書架上、地上、桌上，甚至床上，一個自己熟悉的空間和景象，在這深沉的夜裏，竟然帶給我無限的新鮮和喜悅的感覺，就像一個小孩子在冬夜裏看到初雪的驚喜，彷彿有一種聲音說：「起來吧。」

詩晏塔在窗前，一眨一眨的，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在扮着鬼臉，我推開窗，一陣寒風使我清醒過來：

「溫暖和喜悅只是小室裏所有的東西。」

外面是黑暗覆蓋着大地，無限遠的伸展開去。多少次，透過黑夜，我遙望着東方那塊古老的大地，數着來去的日子，想着自己遠方的朋友。

「朋友」這一個概念閃過的時候，我想起剛才圍在一起的他們，我惦着腳走出去。一個烟霧薰過的空間，還留有酒後的餘香，杯、碟，還有書本，有點散亂的放在四週，彷彿是一幅未完成的畫。不，他們的本身才是一幅幅未完成的畫，他們用青春的色彩，在他們生命的畫布上，努力的，一筆一筆的用辛勤的勞動和驚人的毅力去塗抹着、修改着。無論這畫面將是成功或是失敗，鮮艷還是灰色的，那創作的激情，總是令人感動的。

頭有點重，但有一種感覺始終依附着我，彷彿昨夜酒醒的時候，曾有過許多的感觸，我檢起地上的一本書，是剛才他激動的時候，不經意的掉在地上的。於是我想起：昨夜開始時，像往常一樣，從天氣到電影、到生活、工作，平日被思索，被壓抑的說話，漸漸展開……直到其中一個人說：「我想說一個合理的社會。」

「合理的社會？」大家哄地笑起來，彷彿他剛才說了一句很可笑的笑話。

接着的是沉默和期待。

「社會要有平等分工的權利，每個人有相同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並且保障它，財產是不可以轉讓的。」

「人的思想來源於社會的經濟結構，所以私有的社會才有剝削和壓迫。」

.....

於是，我們熱烈地辯論着，但到最後，也許是喝得太多了，我什麼都忘記了。

事實上，我為什麼要記住這些年輕人的說話呢？一些若干年後，也許他們自己也覺得可笑的說話。除了一句：

「每個人都要為他們被統治的方式負責。」

他低頭慢慢地攪動杯裏的咖啡，半晌，抬起頭來，半帶激動的說：「我認為一個人不可能永遠的抒情下去，人的思想是隨年齡環境而成長，以前，我對事物的看法是存着一種憧憬，只知生活在自己的幻想裏，現在看起來，那實在是天真得可笑，今天的我，已經從夢幻裏醒覺過來，不能再像以前般只寫那些不負責任的花月文章，我必須對自己的同胞，或甚至下一代負責任，將這時代的弊病，明確的指示給他們看。」「但是」，我甚感興趣的問道：「你可曾有一個解決的辦法給他們，你對這些時代性的難題，有沒有一個答案呢？」

他煩惱的皺了眉頭，頹喪地搔着頭：「老實說，我至今還未找到答案，這亦是這些時日來苦惱我的原因，我感覺自己像一葉浮萍，無一塊立根之地，四處飄蕩，我不甘心隨波逐流，却又無法擺脫現實的枷鎖。我們這一代實在太苦了，時代的衝擊，使我們連一個明確的身份也沒有，更談不上甚麼正確的目標，就像一羣被遺棄的人，到處摸索，企圖尋找一處屬於自己的歸宿。這便是我出國的目的，當時，滿以為到了這個家人欽羨的黃金國，便可勤懇地創一番事業，開闢自己的天地，誰知來了這人地兩疏的異鄉，不但不能找到安居之所，反而更加添無根的感覺。在這個高度物質繁榮的社會裏，人僅有一點尊嚴，也被物質所攫取，它縱然餵飽我的肚腹，却填不滿我的空虛，我愈來愈迷惘，難道千里迢迢的跑到這裏來，便是為了那汽車洋房嗎？我究竟在追尋什麼？我厭倦西方社會那種病態的虛無，却無法找出生命的答案，我嚐試去追求世俗的色彩，却發覺一切的狂歡，只是短暫的麻醉藥，我底心靈仍在呼喊著無根，失落，徬徨。我寫作，我竭力的要把這一切寫出來，我承認無法開出一張良方，更切合點，應該說我只是個病人，正在向醫生傾訴病徵，希望能得到醫治。」他誠懇的望着我，眼底有太多的痛苦與惆悵，令我不忍卒睹。坐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位懦弱者，相反地，他是一位願意忠實地面對生活的戰士，他透視現實的矯偽與虛空，他希望能對生命負責任，却不知應從何着手。

朋友，我是多麼的同情你的遭遇，我是多麼的瞭解你的心情，不要以為只有我們這一代才懂得無根的滋味，在這個世界，有什麼是稱得上永恒的呢？「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却永遠長存。」「虛無」、「失落」等名詞亦不是我們的專有詞句，哲人曾言「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如果你願意細心觀察，你便會清楚的看到世人皆在「捕風捉影，虛空中的虛空。」不要期望別人能替你解答難題，「世人行動實係幻影，他們忙亂，真是枉然。」有多少人能知道自己忙亂的因由？有多少人能認清自己奔跑的目標？

朋友，我們在這世上只不過是客旅，是寄居的。生命究竟是什麼呢？有人說：「生命原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我們若不趁着還有氣息之時，去努力探索生命的真義，去掌握生命的光輝，到了那日，當我們徹悟事物的真相時，可能已經悔恨莫及了。

朋友，生命的豐盛，並不在乎物質，更不在乎智慧或

知識（因為多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乃在乎一位超乎時間空間，在宇宙萬物之上的永恒者，你，又可曾認識祂？

最後的一度

二丁

有個時候，曾想告訴你往那兒去，可是，如今又忘了。

我倆在人生底路上攜手共進已經有四年多的歷史；分歧交錯而去的日子不能說是沒有，最後也許還會有再次碰頭並行的機會。前些時候，為了重大問題底看法爭持着好一會，我們站在十字街頭上分了手。這倒非兩廂情願的抉擇，然而終是決定了。

此後，我們並沒有再相見。既然已是分了手，又何必回戀着過往的一切？相知的人不一定要常在一起，知道對方還活着，有痛苦也有快樂地把持自己的信念便足夠了。你近來怎麼樣打發日子？新識的朋友是怎麼樣的？工作是否愉快？這種種問題我已沒有關心的必要，總該有別的人來補替上我的空缺而去擔憂它們。我也有着自己煩惱的問題，又有誰去關心它？

你到底還是來了，並且約我用文字替自己做點兒思想上的紀錄工夫。我沒有即然拒絕或承諾。紀錄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他所作的一切比文字更有力。但是，我被題目的名稱吸引着。

我底原始而膚淺的基本知識告訴自己，歐基里德的座標祇為三度空間所概括；時間亦僅被分割為過去，現在和將來。四度時空，在我那僅有的一丁兒知識底範疇內，是不存在的。

為了這緣故，我選取了時空的第四度。

× × ×

我們這一代所追求的已經不是幸福，幸福着實離我們太遠。誰也不會否定我們底無根性。物質上的嚮往使我們錯覺地以為抓着了生活的充實感。一幢美好的房子將人們根紮在這個不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上；一輛豪華的房車把人們與這個不相屬的社會底關係縱橫地交織起來。人不再是感性的動物；心智的活動也許早在我們未曾踏足在這塊土地上便已停止；北國的风霜養成我們貪戀室內的溫暖。

尼采底神已死的宣示，並不曾替西方文明帶來新的希望，那死亡後的虛脫要怎樣地被填補起來，是西洋社會面臨最大的課題。沒有人敢遽然否定物質的功能；除此之外，人類還是需要別的。相信權威，死抱主義吧！這樣人有更多的時間空談，而不需思考。

在我們那古遠而健在的社會裏又怎樣呢？人們紛紛拋掉那沉重的包袱，像是要挺起胸膛，昂首瀟灑地前進似的。讓那些製訂口號的人接受片刻的光榮，因為他們將被新的口號所推倒並踐踏。祇有羣衆那頑昧而堅忍的頭腦才把事情看得透徹。歷史是要前進的，但不能飛躍。

「我不再把自己交付到任何人的手裏去」，這意味着頭腦清醒如何索者必須面對悲劇收場的來臨。在狂風暴雨中掙扎過的不一定可以壯茁起來。依附吧，在死亡（還是時間？）沒有奪去長成的機會之前，讓自己接受太陽的擁抱。你會因此而無怨。

P21

「四人幫」垮台的前因後果



· 小卒 ·

前言

毛澤東遺孀江青、中共第二副主席王洪文、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張春橋、中共政治局委員姚文元等四人最近的倒台，顯示了自毛氏去世後，中共黨內長久以來蘊藏着的政治鬥爭的一次爆發。這爆發來得如此之急，其形式如此之暴，證實了中共黨內一向存在着的兩派之爭，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否則在毛氏甫逝，各國集中注視中國局勢發展的時候，中共領導人至少可以等待一段時期，才引爆此枚足以遭反共集團大做「權力鬥爭」文章的計時炸彈。現在的急不及待，表示了所謂「激進派」（以江、王、張、姚，在文化大革命後躍起的「文革派」為主）與「溫和派」（以元老級軍人、幹部如葉劍英、李先念、許世友、聶榮臻為代表）之間，已從「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非以政變的鬥爭形式解決不可了。究竟這所謂兩派如何與何時產生？其各自代表着什麼的政治路線？這兩派之中，那一派較受人民擁護？江青一派被打倒之後，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是有益，還是有害？這許多問題，相信是每一個關心祖國的人都渴望了解的。筆者雖自知知識有限，仍本着關心國是的态度草成此文，希望引起大家討論。

× × ×

「溫和派」的發展經過及其團聚的基礎如下：

從中共黨史來看，黨內出現的路線分歧，該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下旬，當毛澤東從莫斯科回到北京，提出「大躍進」、「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政策所引起的爭論最為嚴重。毛氏提出三面紅旗，以為可以躍進到「一省之內也可以實行共產主義」；那時一方面由於毛氏在黨內的崇高威望，另方面莫斯科之行索取

更多蘇聯援助的失敗，「自力更生」的口號聽得進，所以「三面紅旗」作為推進中國經濟的一個政策，在沒有什麼大爭論的情形下被通過了。可是「三面紅旗」推行了一年左右，其不能繼續下去之勢已是明顯，加上克里姆林宮落井下石，於五九年撤退全部專家，嚴重地加深了中國的經濟危機。在種種災禍的襲擊下，中共黨內本來便認為「三面紅旗」是冒險主義的一批幹部（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便抨擊毛氏的「小資產的狂熱」；甚至與毛氏一向過從甚密的譚震林、陸定一、薄一波等副總理級幹部，也開始不滿毛氏的冒進政策。彭德懷在五九年九月的廬山會議上首先發難，炮轟「大躍進」，雖然後來毛氏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倒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註一），但是他在黨內的威望卻從此一落千丈。事實上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氏已自知不得人心，五八年十一月武昌舉行的六中全會中，毛氏即宣佈不再担任下屆國家主席，改由劉少奇繼任，並在政治局裏退居第二線，讓劉少奇、鄧小平等掌握第一線，以劉、鄧為首的，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攻擊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批幹部，遂以收拾「三面紅旗」所做成的殘局為起點，建立了「溫和派」的基礎。從文化大革命中揭發出來的資料看，劉少奇等實則支持彭德懷的意見，只是彭氏攻擊毛氏太過火，被迫棄車保帥而矣。劉少奇掌權時代的路線，由於是以收拾殘局為基礎，不得不偏重於現實，不得不「修正」三面紅旗的政策。例如一九六〇年一月李富春（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發表文章，即提出「以農業為基礎」的口號，修正了五八年五月八大第二次會議所通過的：「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着重點是筆者加上）的政策，抗衡「以鋼為綱」，「全民辦工業」的大躍進路線。劉少奇一系的幹部指責「三面紅旗」的失敗

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本人且在一九六二年春天的七千人大會（五級幹部會議）上公開抨擊「三面紅旗」，推出了「三自一包」的物質刺激路線。同時配合經濟上的溫和政策，劉少奇一系在文化領域上放寬，科技上著重提高科技水準，產生了要「紅」還是要「專」的爭論。文化大革命則是毛氏爲了要打倒這些溫和政策（即中共所說的修正主義）而發動的一場政治鬥爭。劉少奇、鄧小平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但是「溫和派」不但沒有被打倒，而且由於文化大革命以軍人介入鎮壓造反派羣衆收場，成立以軍人爲主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爲結局。毛氏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並沒有達到它原來想達到的，即徹底打倒以劉、鄧爲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目的，相反，「溫和派」以更團結的面目出現。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奪權只是曇花一現似的假奪權，支持劉少奇路線的軍人以譚震林爲首，反擊毛氏的奪權（即二月逆流）。一九六九年九大，實質上是軍人掌握了權力（註二），到了十大之後，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打倒的幹部紛紛翻身，成了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時代。劉、鄧集團的鄧小平復出之後，已差不多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班底了。

× × ×
「激進派」的發展經過及其團聚的基礎如下：

所謂「激進派」，實則指在文化大革命中湧出來的一批幹部（所以又稱「文革派」）。由於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向劉少奇的溫和政策挑戰的一場政治鬥爭，是從「左」方面向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攻擊的兩種傾向上的鬥爭，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等文化大革命的悍將自然以左派自居，毛氏自始至終都支持他們。他們的「政治掛帥」路線，正是毛氏用以攻擊劉少奇一系的武器，如果我們說劉少奇一系的基礎是修正「三面紅旗」的路線，那麼江青一系的基礎便是要承襲「三面紅旗」的精神的，「政治掛帥」、「發揮主觀能動性，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如果我們說「溫和派」的基本實力是以穩健爲主的老幹部，那麼「激進派」的基本實力則是文化大革命中衝擊老當權派的年青幹部（當然，兩派之中也各自擁有老、中、青三代的幹部，但一般來說是如此）。這一派不講求實際，只抽象的談「政治第一」，於是在實際的政策推行方面，往往犯上主觀主義的毛病。文化大革命後的許多政治運動（如反潮流、批水滸的投降主義、抑儒揚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都是他們在意識基礎上向「溫和派」攻擊的運動；然而由於文化大革命的「亂子」攪得太大了，大多數幹部（特別是軍人）懼怕及厭惡造反運動，他們在黨內始終歸於少數。毛氏在生之時「溫和派」碍於毛氏的威望，不敢向他們下手，但是不滿的情緒只有加深，而沒減少。毛氏一旦逝世，矛盾立刻尖銳化，缺乏實力的「激進派」倒台自是當然之事了。

× × ×
今天中共官方的說法，是「四人幫」的陰謀野心早被毛氏本人看破，並且面授機宜與華國鋒，要求打到這「四人幫」。筆者認爲這說法不可靠，因爲以毛氏在黨內的威望，倘若他要打倒這四人，當是輕而易舉之事，何況「溫和派」早已恨這四人入骨？「四人幫」如不是有毛氏的支持，早被打了下來，是最簡單不過的事。現在中共假借毛氏之遺言來打倒他們，不外是死口無憑，勝者爲王，敗者

爲寇矣！

然而一般人究竟是否支持「四人幫」？究竟是否擁護以華國鋒爲首的「溫和派」？

我認爲，「四人幫」是不得人心的，但是不得人心的原因，却斷不會是因爲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作了什麼奸，犯了什麼科；一般人民不滿他們的主要原因，據我看來，是「四人幫」所代表的「激進」路線：什麼革命樣板戲、重紅不重專，教育革命、上山下鄉等政策。七五年的杭州工潮與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門事件，便是這些不滿情緒的充分發揮，他們或多或少把歷年來受盡壓迫的怨氣發在這四人身上。好像他們便是一切官僚專政的象徵。人們支持以華氏爲代表的「溫和派」，並不是了解到兩派的什麼政治分歧，而是一種渴求新的統治出現；人們希望以往的壓迫會隨著「四人幫」的垮台而完結。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是支持新中央的，由於中共一直以來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處事作風，他們的信任不會是全無保留的。

總的來說，「四人幫」的倒台，表示了一種傾向壓倒了另一種傾向，中共的路線將會有所改變。國內方面，「政治掛帥」的口號，不會馬上被放棄，但實際上將會強調經濟建設；文藝政策將會放寬，人民生活將會得到某程度上的改善，上山下鄉政策將會在執行上緩和，教育方面將會比較上重視專業技術的發展。外交政策方面，「革命外交」政策在一段時間內不會改變，「聯美反蘇」仍會是主流，不過新的領導層對蘇聯將會採取比較緩和的態度（今年蘇聯慶祝十月革命的紀念會中，中共代表十年來第一次沒有退席），則似是事實。

關於「溫和派」當權後，中國是否會逐漸走向自由化，是否會因爲著重經濟建設而助長了國內資本主義復辟傾向的問題，是值得認真考慮的。毛氏在生前特別強調「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個問題絕對不會因打倒了四個人便獲得解決，毛氏曾經強調反官僚特權，這個口號應該繼續提。我認爲倘若說中國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那危險誠如毛氏所說「來自黨（中共）內」；華國鋒代表的溫和派要是不克服官僚特權的問題，那麼文化大革命時期曾經出現過的反官僚鬥爭必會重演。事實上，要確保資本主義在中國不會再生，主要應該放在人民羣衆（特別是工人）對當權者實行監督，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那才是真正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做法。因爲誠如毛氏所說：「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是要認真留意的。

註一：艾德加·史諾在「漫長的革命」裏記載，「毛爲了贏得不信任彭的決議，必須從他的全部威信支持全會上的辯論」。

註二：九大與八大之間最顯著的分別，爲職業軍人在九大里佔的比重。譬如說八大的主席團六十三個成員中，只有十一個職業軍人，佔17.6%，九大的主席團一百七十六個成員中，却有六十四個職業軍人，佔36.36%。

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中國共產黨內的鬥爭立刻爆發了。「四人幫」被打倒，我們還記得四月三日天安門十萬羣衆的集會和暴動，主要的口號就是「打倒慈禧太后」，可是羣衆被殘酷地鎮壓了。毛澤東死後黨內鬥爭爆發得如此之快，一方面由於「四人幫」面對羣衆的反對，急於奪權，一方面華國鋒從天安門事件中得到啓示，即江青一點是十分不得人心的，打倒她們是易如反掌的，事實證明如此。華國鋒在政爭上取得優勢，比之赫魯曉夫輕易得多，赫魯曉夫面對的是強大得多的史大林的嫡系，需要四年之久，羣衆的解脫史大林運動有不可遏止之勢，赫魯曉夫才能順應羣衆要求取得勝利。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由姚文元批評「海瑞罷官」開始，「四人幫」和王、關、戚、陳伯達、康生、林彪等，都是極重要班底，他們叱咤風雲的當年，周恩來也曾喊過「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林副主席學習」，文化大革命由欽定轉變到以羣衆爲主動時，毛澤東自己承認用「黑手」撲滅了它。文化大革命進行當中，陸續有人倒了下來，倒得徹底，倒得與「反革命」同科。最後祇留下「四人幫」，毛澤東一死，「四人幫」已無蔭蔽之處，被打倒的命運是決定了的，但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政治的整個失敗，決不是「四人幫」的個人失敗。

文化大革命の後期轉變，使毛澤東在羣衆中喪失了所有的歷史威望，「四人幫」一切不得人心的行爲和言論，眞如現在對他們宣布的罪狀所說，羣衆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頭」。

但黨內鬥爭完全出之以政變形式，這就表示中國共產黨黨制和政制的官僚主義化，已到了極深程度。官僚主義化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絕對矛盾的，這是中國歷史性的落後結果。革命的向前跳躍，解除了帝國主義壓迫，消滅了封建關係，但要使社會主義經濟一天等於二十年，事實上並無可能，由此產生官僚主義的墮落，毛澤東時時想用各種運動從內部洗刷官僚主義。但文化大革命後，他再也不敢利用羣衆力量了，他的所謂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爲綱，祇成爲黨內派別鬥爭的藉口，到對立的二派赤裸裸地借助政變手段以求達到各自的目的時，暴露出這和羣衆之間的鬥爭並無關聯，而祇是官僚階層內部的奪權鬥爭，這是中國歷史的老規律，「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勝利者加冕，失敗者則衆惡所歸，負担一切罪過。

自從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以來，中國並未實現過無產階級專政，而祇是中國共產黨專無產階級的政，毛澤東則專中國共產黨的政，這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主義的黨制與政制，毛澤東一死，在政權競奪中的勝利者，襲用毛

澤東的衣鉢，崇拜華國鋒，歡呼華主席萬歲，印行華語錄，祇有華國鋒一個人是眞正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將來在馬、恩、列、史、毛之外，再加上一個「華」字。

有人會反駁說：毛澤東生前是早知道這種發展的禍害的，所以他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警告走資派正在走，史諾早在他的「漫長的革命」書上證明，「毛根據他的結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黨正走着修正主義（蘇聯）的復辟資本主義道路；正在誕生一個新階級，一批官僚權力的統治者，一羣脫離勞動脫離人民的幹部貴族。」

可是如何消滅這樣的幹部貴族呢，他勸人多讀些馬列主義的書，他指出八級工資制，但決不放鬆官僚統治的箝制手段，他不讓敵對派系有發表政治意見的自由，更不讓無產階級有民主的存在，事實上這只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方法。

要消除官僚主義政制的禍害，必須實行巴黎公社式無產階級的專政與民主，沒有無產級民主也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恰恰完全取消了這兩者，所以他不僅無法反對幹部貴族，而且大量助長這種貴族的產生，「四人幫」就是最大的貴族，在毛澤東羽翼之下長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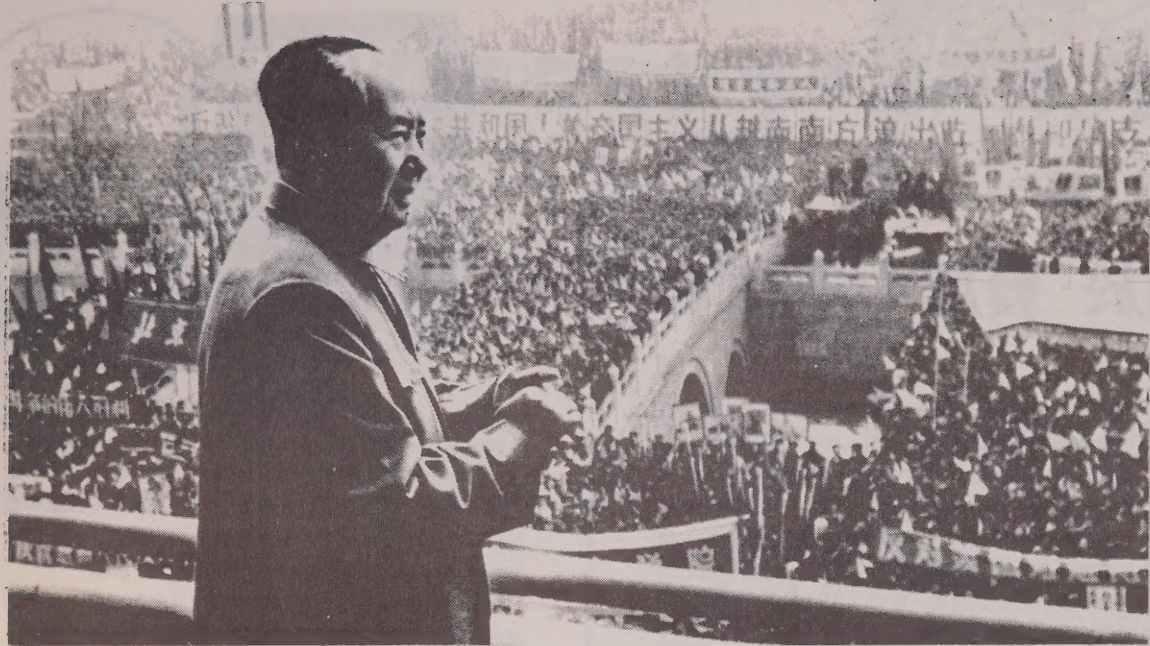
江青知道她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命運如何，所以想藉美國作家維姬夫人替她樹碑立傳，有如史諾之於毛澤東，史沫特萊之於朱德。這兩個確是英雄人物，值得人們欽敬。可是江青不論如何粉飾自己，祇看作者所描寫的她的生活動態，就足冒犯任何一個稍有革命精神者的道德感情。

「在第一次會面中，江青頗有戰鬥性地和激動地說到她的童年和一大堆其他問題，大約兩個星期後，我們再次在廣州「秘密」會面。這個熱帶環境的南方城市，遠離北方首都的政治壓力和毫不容情的政敵，……每晚說話開始前，都來一套顯然令江青感到樂趣的儀式：服務員送上以銅絲線串起來的茉莉和小蘭花，江青熟練地把這些花串連在我們每一把的檀香扇柄上，然後，我們才開始長談，一面悠閒地揮動手中香氣襲人的扇子，趕去廣州黑夜熾熱潮濕的空氣。

江青流露了一種比較柔和，比較優美的個性。周圍既沒有了和她同等級的其他領導人，江青獨個子可以更自由自在的表露她的個性和想像力。

……她不時微笑，開懷大笑，然而即使在極認真和嚴肅的時候，她的儀態仍令人着迷。我們不自覺地隨着她的顧盼、她的優雅的手勢和快語，坐下來，立起來，前往另一個房間，進晚餐，或者在室內踱步或園中散步。……我們每次會面的時候，她的隨員可不少：兩名侍衛、兩名醫生、幾名護士、兩名翻譯、一名記錄一切資料談話的速記員、一名文化部副部長、一位禮賓司副司長、我的兩名助手，間或還有其他的人。」

讀了這樣的傳記，我們幾乎懷疑主人並不是江青，而是宋美齡，而且極容易使人聯想起當年王美光，被江青咬



使紅衛兵鬥她的殘酷的一幕。王光美如果尚在人世，她眼見江青今天的下場，是快意還是苦笑？

珠江電影製片廠錄音車間的工人提出了如下的控訴：

「一九七二年八月上旬，江青竄到廣州和某外國女作家密談，無耻地吹噓她自己，裏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密談的時候，要珠江電影製片廠專門派出三個人，帶上錄音機替她錄音，她同某外國作家說話的時候用四合錄音機在四個不同的地點進行錄音，但是又作賊心虛，對錄音人員嚴密監視，不許錄音人員戴耳機鑑聽錄音效果，錄音以後十四卷錄音帶馬上就被他們拿了去，連倒片時間也不給。」

除此之外，對「四人幫」的控訴還多得很多，有的超出常理之外，如說江青化二十多萬人民幣拍攝一張照片之類，這裏不再具引，使我們深深疑問的；毛澤東如果知道她們的種種不法行爲，爲什麼不糾正和制裁他們？如果完全受她們蒙蔽，那豈不有傷他的英明和偉大？

官僚主義的罪惡，與毛澤東的統治手段分不開，因爲在生產落後的中國，官僚主義制度化，極少數的統治階層，自然安富尊榮，爲所欲爲了。腐化的程度也許不同，經歷過堅苦的革命鬥爭的如周恩來，雖受國家的種種優待，仍能保持原來的節操，爲羣衆所欽敬，至於鄧小平之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揭發的黑材料，一定仍爲羣衆所銘記；其他一輩從文化大革命坐「直升機」登上崇高地位的人，如王洪文、姚文元之類，則很快就會腐化墮落（最近正大量揭發這種材料），又爲了企圖永久保持這種生活，勢非用政變打倒其他敵對派別不可。政變是一種非法手段，雙方都應用同一手段，他們早已脫離了羣衆，直到政變以後幾乎二個月，人大常委第三次大會才召開。連政治局執委會是否召開也成疑問。

「四人幫」的「按既定方針辦」，被攻擊爲篡改毛澤東的指示，華國鋒的「你辦事，我放心」，又何嘗能取信

於人，祇因勝利者總是對的，如果有人懷疑，就被打入「四人幫」一夥，中國共產黨不容許有異己存在，三要三不要，毛澤東自己就沒有遵守過，這不過是請君入甕的方法，失敗者都是犯了「三不要」的罪過的。「走資派」也是有同樣作用的罪名，昨天用「走資派」整人的「四人幫」，一失敗都成了走資派了。

不管二個派別的利益衝突如何，誰勝誰負，他們都是一國社會主義者，在這個意義上說，也都是毛澤東思想者，也都是對馬克思和列寧主義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和蘇聯以至東歐若干國家的基本立場沒有什麼不同，都想在民族範圍內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對內必然儘量在勞動人民身上積累原始資本，形成官僚統治，對外必然競爭和帝國主義的和平共存，促成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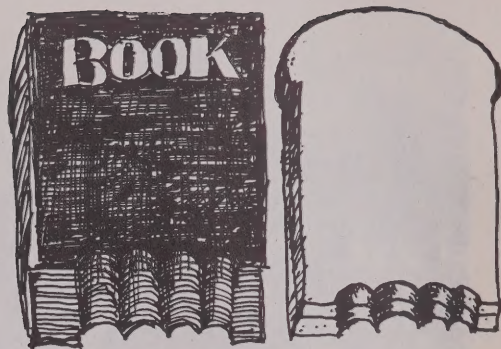
自然，兩個派別之間你死我活的拼鬥，有一定的政治歧見存在：一個「以階級鬥爭爲綱，其餘都是目」，這仍是毛澤東生前最後的意見，用這個立場去罷免活着的鄧小平，批評死掉的周恩來；一個先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反對無限的政治上綱，要安定團結，這仍是周鄧在第十次大會上提出的目標。兩派鬥爭的結果，暫時解決了官僚內部的矛盾，但絕對解決不了整個官僚階層與人民之間的矛盾（表現爲無監督的官僚階層的高級享受與人民生活普遍貧困的矛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矛盾。）華國鋒一派勝利後，拼命宣傳增加生產，絕不說到提高工資，讓廣大農民每年收入依舊維持在最低的水平。

中國共產黨內的派別鬥爭，決不會因「四人幫」的倒台而停止，如果沒有真正的人民革命性的參與，建立社會主義的法制，則黨內鬥爭始終祇能用政變手段來解決，而且貽害無窮！

關於「發展中學教育」

關於「發展中學教育」

國



最近就「如何發展中學教育」這問上，香港教育司署與私立學校之間發生了嚴重的爭論。爭論的始因是私立學校向當局提出了兩項要求，遭到拒絕。這兩項要求是：①當局應放棄興建新校舍計劃，透過發展私立學校（如購買學校）發展香港中學教育。②港府應予經濟援助私校，使能聘用合格師資，改善教學的質素。（註一）教育司陶建發表拒絕私校要求的主要論點、在於：①目前香港所需要的，是將教育發展至最佳水準。私立學校，若要達到及維持此一最高水平，而又不吸取高昂的學費，實屬非常困難。②政府必須興建新校，而且此等新校必須建於居民將要遷入居住及兒童需要入學的新發展地區——即新市鎮。③基本上來說，私人辦教育亦即等於商業投資，若政府對私人學校加以津貼或補助，則等於津貼他們之商業利益。④即使對私校提供相當之援助，他們中之大部份亦將難以追上日後香港所要求之水準。（註二）在教育司發表了此數點拒絕的理由之後，私校人士即紛紛指責，認為政府當局拒絕之理由不恰當，社會人士亦對此一關聯數十萬學生之重大政策表示關心。

究竟那一方的意見較為合理，因而較為有利於中學教育的發展呢？

在回答這問題之前，我們應該先看一看目前就讀私立中學與政府補助中學的學生人數。截至本年（七六年）三月為止，香港的中學生人數為三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五人；其中就讀於政府補助中學的有十萬零六千七百二十二（佔百分之廿九），就讀於私立中學則有十七萬一千八百七十八人（佔百分之四十七）。（註三）從這數字可以看到，私立中學在香港中學教育方面，佔有着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大家知道，無論就設備或師資來說，政府補助中學及不實利中學（即教會學校或慈善性質的中學）都比私校的水準高；私立中學之中，學店式的經營大有存在，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教育司陶建在這方面的指責，不無根據。但是私立中學以往之所以會有這樣蓬勃的發展，主要的原因，却正是由於政府補助學校的學位供不應求之故；否則誰願意付出較多的學費，而接受較差的教育？我認為教育司陶建在拒絕援助私校的時候，必須同時解決政府補助中學的供不應求的現象，才算是對「如何發展中學教育」提出了答案。

然而陶建是提不出答案來的，雖然他說在一九七八年時，當局所興建的新校，將能夠滿足中學學位的需求，

（註四），但是稍為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又是另外一張空頭支票，到時一定無法兌現——就正如政府曾經發出的許多空頭支票一樣。原因很簡單，私立中學的就讀學生，佔了全港中學生之百分之四十七！即使政府有誠意興建「足夠」的中學，也不可能短短兩年內實現，何況這只是口頭「諾言」？

其實倘若政府真的是有誠意「發展中學教育」，「提高中學教育水準」，最應該做的，是推行強迫中學教育，實施免費中學教育。退一步來說，現在要做，也應該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興建新中學，另方面有計劃地，大量地援助私立中學。陶建指出「私立中學若要達到及維持最高水平，而又不收取高昂學費，實屬非常困難」，這話是有相當程度的正確性的，那麼為什麼不援助他們，讓私校不由「收取高昂學費」而又可以「維持最高水平」？如果說這樣做等於「津貼他們之商業利益」，那政府大可規定接受援助之私校劃一收費，津貼私校教師，把他們的牟利變成不牟利；不願意接受此規定——援助的，就讓他們來「自由競爭」好了！這樣一來，牟利主義的一定站不住腳，而學店式的中學也只好關門大吉！

當然，或許只管牟利的私校老板們又會反對的，但是要談「發展中學教育」，「提高中學教育水平」，政府有責任這樣做，起碼比空談兩年內「能夠滿足中學學位的需要」來得實際。

不過人們其實清楚地知道，政府只要每年少運一些盈餘回祖家，援助私立中學甚至建立更多的補助中學，根本不是難做到的一回事。只是，光說援助私立中學，已經遭到拒絕，那奢望當局大發慈悲，推行免費中教育，是比在沸水里尋活魚更難的了。要有一個健全的教育制度，非自己來爭取是不行的，這里又一明證。

註一：明報美東版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二：教育司陶建在扶輪社午餐例會上（十一月十七日）的談話，刊載於明報美東版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成報美洲版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三：同註一。

註四：截至本年三月份為止，本港中小學生人數如下：
小學——六十四萬二千六百一十一人
就讀於私校——九萬六千一百二十八人（佔15%）
中學——三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五人



Letters

關於一份雜誌

一份雜誌

洪志

(一) 一份雜誌

從朋友那裏得知你們醞釀了頗有一段時候的雜誌決定出版，心想總算有一份由本地華人自己辦的雜誌了。也就急不及待的把心裏的意見和期望拿出來跟大家談談。

市面充斥着的雜誌多的是，但都是港、台和國內出版的；那些專寫明星私秘的不用說了，就是那些較嚴肅的，關心社會國家大事的雜誌，也總是缺少關於華僑生活狀況的文章。這當然不是說這些雜誌的負責人忽略了這方面的事情，剛好相反，每次華僑事件發生時，他們不遺餘力的報導和分析；對華僑為了合理生活而鬥爭的行動表示支持，這就可見他們的關心；還有些雜誌發覺長期報導和介紹華僑生活的重要性，特闢專欄給海外華僑報心聲，用以維繫華僑與來源地的密切感情，但這總是不足夠的；華僑每日所遇到的問題，決不能依靠香港的一些雜誌的文章就能獲得解決。一方面，他們需要一些更深入認識他們生活的，或者說與他們息息相關的，跟他們生活在同樣的環境的人去探討和尋求解決的方法；另一方面，在他們現在居住的地方，他們必要有一種凝聚的方式；作為發表意見和必要時行動的中心，希望你們的雜誌能漸漸的負起這個責任罷。在我看來，一份雜誌的意義，不單是訊息的傳遞，它代表了一些人對一些問題的關心已達到要有系統的了解和表達他們的意見的程度，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幾份華人報紙之外，我們祈望着一份雜誌的意思了。

(二) 不再無聲

華僑的問題其實一直都存在的，尤其是早期的華僑史，更是中國痛史的一部份，為什麼到今天又重新引起討

論和研究呢？為什麼被外國人形容為——頗有嘲諷的意味——「堅忍謙讓」的中國人不再無聲？

保釣釣魚台運動當然是一個契機，它提供了旅居外國的華人——尤其青年學生——一個重新凝聚的機會，以一個現代五四的姿態出現，大家都好像「有所歸」了；跟着是中共——無論我們怎樣看待這個政權——國際地位的提高，海外華人間接得到點精神和實質上的利益，而民族感情，使長期緘默的人開始說話了。

人們團聚起來了，說話了；那些向來不為人們注意的問題都重新成為話題，那些從來被人棄置一旁的希望，重新回到人們的幻想裏，這是一件好事；而更好的，是能夠有一種方式——譬如辦一份雜誌——把這些話題和希望帶到有切身關係的人的生活裏，引起更多的話題和希望，作為海外華人尋求解決他們面對的問題的一個基礎。不知你們的雜誌有沒有意思嘗試負起這個責任呢？

(三) 什麼問題

保釣運動後發生的一連串華僑事件尖銳地揭開了一個向來因為華僑們缺乏團結而多少給隱蔽了的問題：就是少數民族的問題。

清末民初的華僑史不用說了，就是近十數年，海外華人——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實在是受盡屈辱的。這裏並不是鼓吹民族報復，而是既然我們已深切認識到問題的迫切性，我們就需要絕不苟且的面對它。排除了那種以逃避問題為目的，只空喊什麼文化溶合或者大中華民族文化優越等的論調；從少數民族實際生活的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作確切的了解，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每次經濟危機出現的時候，移民法又加上嚴格的限制；為什麼又有些洋大人——那些曾經說過移民怎樣對地方的繁榮有所貢獻的——又跳出來大叫少數民族是通貨膨脹的罪魁了。

這是華僑與多數民族間的問題；華僑內部本身的問題也不少的。例如近來的新移民當中，不乏富商巨賈，他們都不像以前的移民那樣為求溫飽而飄洋過海，實際上，他們很多時都以他們的同胞的剝削者的姿態出現。對於這些人，我們又怎樣去了解呢？在實際的華僑活動中，他們又

將佔一個怎樣的位置？

此外，還有那些愈來愈多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華人青年，在接受教育的同時，也接受了北美社會的價值觀，他們要過那種受人欽羨的生活了，於是他們一移出受鄙夷的唐人街，自己更帶着一顆鄙視這個小世界的心；到底在這些飛黃騰達——最小是希望飛黃騰達——的知識份子那裏我們又看到怎樣的問題呢？在他們與那些曲着背流連在唐人街的酒家食肆裏的無言的老太婆之間，又橫亘着什麼？

在談到華僑和多數民族之間，華僑內部之間等問題時，當然還有華僑和來源地之間的問題。保釣後，國事的討論（港、台當然有它們現存的個別的社會問題，但推到最后，港台的問題也必然是國事的一部份），在海外華人圈子裏再不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了。鼓吹關心國事，並不單單因為我們是黃皮膚黑眼睛那麼簡單；主要的是：關心國事，是關心人類世界和周遭社會的一方面。中國這數十年的巨變，必然地成為世界歷史重要的一部份。不去了解這些影響我們「切身」事情的問題，我們也無法了解我們的「切身」問題了。

（四）怎樣談問題

很多人談問題的時候都誤以為「中立」就是好的；然而什麼是「中立」呢？他們却無言以對。其實站在一個立場上說話又怎樣，只要是光明正大。我說光明正大，並不是一面說「擺事實，講道理」，一面却亂派帽子。這實在跟大喊「雷」，「匪」，「特」，「探」，有什麼分別？現在關於海外華人的問題的探討很多時都陷入一種感情上的盲動，教條主義式的口號代替了問題的分析，這些都不是好現象。我想除了那些潑婦罵街式的「討論」態度之外，其他各立場的意見都該容納的。這並不是調和主義，只是在現階段，各種意見的表達可衝激那種盲動的教條，而各種意見到落實行動的時候就可見真正的高下了。

（五）至誠的祈望

當然一份雜誌不能那麼枯燥的只談這些問題，上面所舉的，主要是祈望這份雜誌的特色，因為這種特色，只有海外華人自己辦的刊物才能有，而實在又依着實際需要而出現。至於其他方面如文學，藝術，音樂等，當然也是我們思考和接觸這個世界的另一些方法，這點你們一定考慮到的，也不用我再談了。

說了那麼多，雖然不一定是什麼好意見，但總算是對一份海外華人雜誌的祈望。

一封英國的來信

袁兄：

來信談及出版刊物，促我寫點東西，謹如命。

由於經濟危機，許多國家都出現了限制移民的問題，而其所持理由，又多以「移民搶去本地人的工作、無經濟建樹」等充滿種族主義氣味的說法為根據；種族歧視的氣氛，越來越濃厚，在你身處的加拿大如此，在我暫時棲身的英國亦復一樣。英國的種族主義者主要針對亞洲及非洲移民，其中又以印度、巴基斯坦、烏干達、香港、星加坡、馬來西亞來的最受歧視，近日有色人種遭受襲擊的新聞時有報導。上月（九月）這裏的一些團體發動了反種族主義的遊行，便是這問題日見嚴重的具體反映。

然而可悲的是，這裏一般的中國人對此問題的反應非常被動，極之缺乏醒覺。我曾經和一些華僑團體討論過這種族歧視日益嚴重的問題，並且還以美國紐約的姚揚動事件為例，說明種族主義開始在各地抬頭，促他們予以留意，可是反應是令人失望的。我認為這樣的處身事外的老套很要不得，因為人家事實上正向我們進攻，裝作看不見是不成的，這不是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問題，而是休戚相關的問題。今天他們向烏干達來的移民下手，明天就可以把矛頭指向我們。在那些種族主義者看來，有色人種是劣種，這可包括我們黃皮膚的在內。記得郭兄曾經寄了某份加拿大雜誌的剪報給我，內中 Dong Collins 一文，大肆攻擊從香港到加拿大的移民，說明了種族歧視問題，在加拿大亦是不能忽視。想來想去，我認為假若我們現在還不組織起來，給種族主義者看看我們的團結力量，則問題必將更趨嚴重。

海外的中國人一向團結性不夠，雖然在過去數年來比較改進了，我覺得仍然很不足夠。當然這不夠團結的原因很多，譬如說許多人習慣性上的事罷，無論香港來的或是台灣來的，我們在過去的社會里，都由於種種的社會原因，不習慣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好像這些事與己無關似的，却不知根本沒有這回事。另外華僑團體之間或基於政治上的背景各異，或基於長久以來，只注重康樂活動，各團體間的調協性也就不好，警覺性不高，這情形在英國是如此了，不知加拿大方面如何？

我以為倘若要反擊種族主義，海外華人便應該團結一致，不同意見的可以批評，可以各自表明立場，但就是在反對種族主義這個別問題上，組成統一陣線，這是起碼的第一步。

我對加拿大的華人社會缺乏認識，不敢妄下斷語，不過想來反對種族主義的統一陣線策略，也應該適用於加拿大罷！倘若你有什麼更具體的意見，或是根本不同意我所說的，希望寫出來討論，討論！

弟 陳耀

七六年十一月六日倫敦



也是童話

方生

有這樣的一個童話，相信很多人都聽過：從前，一隻雞雛給樹上丟下來的一枚小小的菓子打着了小小的腦袋，就四處奔走，驚呼天塌了。於是引起了一大羣鴨太太，雞公公，鵝姥姥，豬先生奔走相告，惶恐萬狀；後來碰上了狼先生。狼先生聽了情由，表示關懷，把它們都引入了狼窩，葬入狼腹了。這個故事的教訓是：第一，謠言是何等的可怕；第二，「羣衆」是何等的盲目；第三，野心家懂得利用謠言的散佈和「羣衆」的情緒，手段是何等的陰險和毒辣。

也有這樣的一個童話，鮮爲人知。

有一天，雞雛小弟弟看到半壁天塌了下來，惶恐萬狀，四處奔走求助。

先碰着的是養尊處優的豬先生。豬先生正在呼嚕嚕地睡大覺，給他喊醒了，便眯着豬眼，噘着豬鼻，豬頭豬腦，生氣地說：「人家好好的在發白日夢，發得正甜，幹嗎擾醒人家？天塌了？那不關我的事，我仍然堅持要繼續做我所高興的白日夢。」說完又呼嚕嚕地重入夢境，再也叫不醒了。

其次碰到的是孔雀太太。她正在試新衣，對着鏡子，左看右看，前看後看，風姿綽約；風情萬種。「天塌了？我可沒有功夫和心情管這些閒事。我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辦。例如今晚有位名流辦了個宴會，參加的都是上流社會的人物；在那名流再三懇求下，我才答應了出席。我是多麼的重要，人們對我是多麼的尊崇啊！找一套合適的衣着是最頭痛的事，因爲我實在太美麗了，全世界最好的衣服都配不上我，……。」孔雀太太無休無止地自讚自歎，完全陶醉在自我之中，根本不會想到別人，更何況是天出了什麼岔子。

再碰着的是拿着酒瓶兒的鴨先生。這位醉鴨步履不穩，身子左搖右擺，險險滾倒在地，還翹着鴨嘴，嘰嘰呱呱地哼着：「花開堪折直須折，……今天有酒今天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在酒肆裏對妳一瞥，總勝過在聖殿中全然落空，……噯？天塌了？哈哈！」鴨先生狂笑幾聲，又淚下如雨，頹然倒地。

再碰着的是架着深度眼鏡的猴子博士。猴子博士正埋在書堆裏，抓耳撓腮，搖頭晃腦，眼珠兒骨碌碌地轉。「天塌了？那不可能是事實，所以我也不相信是事實。事實之所以是事實，須要經過一番調查，研究清楚，證實是事實，那才是事實，光是嚷着是事實，也不一定是事實。在事實面前，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能吹毛求疵，也不能譁衆求寵。你口口聲聲說天塌了，沒有事實證實，所以不成事實，不成事實就不是事實，不是事實而說成是事實，便是不誠實，……」猴子博士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套道理，這套道理據云就是著名的「猴子的智慧」了。

再碰着的是垂頭喪氣的鵝公公。鵝公公的身子軟軟地癱在搖椅上，脖子掛在椅背上，全身彷彿是虛脫了一樣。



杜米埃：和平——田園曲

「天塌了？唉！我早知道有這樣的一天，祇不過未曾想到會來臨得這樣快。老天總是有倒塌的一天，我們都眼睜睜地看着，等待着大禍臨頭，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對這個大災劫，我的心理早已有了準備了。今天，大限到了，你完了，我也完了，大家都完了。什麼是非善惡，功名利祿，統統都完了，不論貧富貴賤，是敵是友，都一齊完了。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鵝公公上氣不接下氣，咕咚一聲倒栽在地上，不醒人事。

再碰着的是足智多謀的豺狼先生。豺狼先生其實就是把天弄塌的傢伙，然而他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誰也不知道他闖了大禍。「天塌了？我可不信這回事。這個世界不是和和和平，安寧寧寧的嗎？你跟我說，那一邊的天塌了下來？」

「在那兒」，雞雛小弟弟伸手一指，殊不知豺狼先生也伸出一隻手來遮住了。豺狼先生的這套拿手本領，就是有名的「一手遮天」。

雞雛小弟弟走得腿也累了，喊得喉嚨也嘶啞了，却一直都沒有人理睬。於是，他祇有蹲在地上，屏着氣，伸着頸，瞪大了眼，呆呆地望着又多了一條裂縫的天，一言不發。這個滑稽的神態，叫做「失落」。

看電影 • 何處去

夸父

電影院的霓虹燈，正散發誘人的光輝，照耀多倫多市的每一個角落。儘管你來自不同的階層，一經觸及這光輝，便磁鐵般被吸引着。它的笑靨，閃耀的色彩及光澤，彷彿告訴你歡迎你到我的暗室內，歡渡愉快的二小時。不由自主便從懷中掏出三塊半錢，購票入場尋找失落的過去，或理想中的將來。

並非每一齣電影都可以滿足任何一個觀眾，尤其是視電影為第八藝術的，要求更為嚴格。濫竽充數的商品自難符合觀眾苛刻的標準，三塊半錢豈不白白浪費去了；再者不滿荷李活壟斷整個北美的電影市場。觀眾在沒有選擇餘地下，遂有猶疑不決，徘徊於電影圈之外；隔岸觀火實為不良現象。筆者願意拋磚引玉，重新引發廣大羣眾對電影的熱情，再次參與茁長中的新生藝術的行列。現就提供一些去處，讓讀者參考。

以下要介紹的電影院可分為非牟利的團體式商營的私人機構。首先是「安大略科學館」(Ontario Science Centre) (註一)，館內的小放映間鮮為人知，那知內裏藏有不少為人忽畧、或是經典的作品，不時還邀請導演或演員隨片出席。去年底曾經舉辦丹麥、日本、埃及電影月，回顧默片笑匠神經六(Harold Lloyd)及羅路與哈地(Laurel And Hardy)的電影，還有七六年的康城電影節(Cannes 76)、荷李活的美國歷史(Hollywood's History of America)等不同地域製作的電影。其次是「安大略藝廊」(註二)(Art Gallery of Ontario)地庫的小放映間，這個祇有一百五十座位的小影院有定期性的放映程序，通常是圍繞某主題作系統編排，像去年便有意大利旅程(Voyages in Italy)，包括弟昔加(Vittorio De Sica)、維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羅素里尼(Roberto Rossellini)、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柏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等人的作品。戰後意大利各著名導演的電影皆被選入放映，適宜互相比較，作深入研究之用。

「劇院」(Cinema Lumiere) (註三)及「舊片倉」(Revue Repertory) (註四)皆為法國氣味十足的名字，顧名思義可知其選片的標準是以歐洲導演為重心，有法國新浪潮(New Wave) (註五)諸人、瑞典的英瑪褒曼(Ingrid Bergman)、意大利的雲末娜(Lina Wertmüller)、德國的費斯邊勒(R.W. Fassbinder)、瑞士的亞倫丹勒(Alain Tanner)、英國的簡羅素(Ken Russell)、日本的黑澤明、印度的薩耶哲雷(Satyajit Ray)，此外還有艾特曼(Robert Altman)、布紐曼(Luis Bunuel)、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尊侯士頓(John Huston)、奧遜威爾斯(Olsen Welles)皆歸入其範疇之內，歐美新血大師共冶一爐，可見其並不局限於小圈子之內。但是他們的弱點在於流動性不大，經常於數月內重複放映同一齣片子，故不及藝廊及科學館那麼推陳出新有力，不過仍不失為重要支柱的中堅份子。

最後要介紹是各大學學生會的電影聚會。多倫多大學(UofT) (註六)的中國同學會不定期放映中國電影；餘者多大校院內二所公共會堂(註七)及Ryerson理工學院的劇院(註八)皆騰出空餘時間，供作同學欣賞電影的會場，選映的均為熱門電影，不鑽牛角尖，不唱高調，娛樂性豐富，也不失其咀嚼回味價值的電影。

要補充一點是New Yorker、Roxy、Screening Room、Downtown Centre等影院也偶有佳作，藉得留意。

讀者於讀畢此文後，可有重新享受這感觀藝術的動機！

●上述各影院的時間表可向692 A Yongest. (Hovse of Lord 對面)二樓Cine Books Shop索取，或收聽Chum-FM 每天上午十一時半及五時半的新聞報告，或參考週末出版的Star Week。各院校電影則須留意各院校的通訊或招貼。

註一：Ontario science center
770 Don Mills Road,
Tuesday to Friday at 7:30p.m.

註二：Art Gallery of Ontario
317 Dundas st.W at Beverley st
Saturday & Sunday afternoon

註三：Cinema Lumiere
290 College St. at SpadinaAve,
Daily at 7:30p.m.

註四：Revue Repertory
400 Roncesvalles
Daily at 7:00p.m.

註五：新浪潮! New Wave
高達, Jean-Luc Godard
杜魯福 Francios Truffaut
查波爾 Claude Charbol
伊力盧馬 Eric Rohmer

註六：中國同學會——中國電影
Mechanical Building
King's college circle

註七：SMC Film Club
Carr Hall auditorium,
St. Joseph St.

Free SAC film
Medical Science Auditorium
OSIE Auditorium
252 Bloor st.W

註八：Ryerson Polytechnical Institute
43 Gerrard Street East

編者按：一九〇三年（清光緒廿九年，農曆癸卯年二月），晚清學人梁啟超曾暢遊北美洲，回日本後整理旅遊隨筆，集合成「新大陸遊記」一書。據梁氏自言，「新大陸遊記」並非一部普通記載風景的書籍，而是一本「惟歷史上有關係之地特詳」的遊記。因此，「新大陸遊記」可算是記錄本世紀初華僑在北美洲底生活狀況比較詳盡的書。本刊在這裏予以節錄並分期轉載，俾讀者可以進一步瞭解華僑在北美洲的生活史。

（一）一九〇三年旅加華僑人口

二月初六日（編者按：即一九〇三年三月四日）凌晨，舟入加拿大屬溫哥華島之海口。兩岸青山，如送如迎，左英屬，右美屬。山皆秀麗，灌木如莽，舟行於朝曦融曳之間，頗極快遊。

午後一點鐘，舟抵域多利，維新會同志李君福基等迎於碼頭者數十人。舟停十五分鐘，即啓行。溫哥華及二埠之同志葉君恩、劉君章軒、李君佑樞等亦至域多利相迎。夕間抵溫哥華，同人迎於碼頭者復百餘。

英屬加拿大凡分七省，其沿太平洋海岸者為布列地士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計加拿大全屬華人約二萬，而哥倫比亞省居十之六七焉。哥倫比亞省之首府曰域多利（Victoria）。其附近大都會曰溫哥華（Vancouver 華人俗稱咸水埠）曰紐威士綿士打（New Westminster 華人俗稱二埠），一切華商華工皆麇集於此。計全加拿大華人人數大畧如下：

域多利（Victoria）	五千餘
溫哥華（Vancouver）	四千餘
紐威士綿士打（New Westminster）	一千
天寅米	一千
奶麼	五百
卡拉布	一千
噶黎	一千
滿地羅（Montreal）	二千餘
阿圖和（Ottawa）	二百餘
其餘散在各市者	約三千餘

十餘年前C.P.R.公司築大鐵路之時，華人來者最衆，計全盛時代殆不下七八萬人。鐵路成後，需工漸少。今僅有此數。

（二）華僑在英屬哥倫比亞省的生活狀況

溫哥華市距今十五年前，一林莽耳。自太平洋鐵路公司（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Co.）開大鐵路橫截大陸以通紐約，鑿歐洲交通東方之孔道；又開中國皇后、日本

皇后、印度皇后三船來往於日本及中國。其鐵路之車站、輪船之碼頭皆以溫哥華為終點，故溫哥華驟盛。哥倫比亞省本以域多利為首府，今則勢力全趨於溫哥華矣；地價驟漲至百數十倍。吾華人十五年前來此者既實繁有徒，從無一人肯買地以牟大利者，雖或西友勸之，亦莫或應，此亦學識不足，不能與西人競爭之明證也。

華人之在加拿大者，生計殊窘蹙，遠不逮在美國。其工人之不得職業者十而五六，困苦不可言狀。商人恃工人為生，工業衰，故商業亦衰。蓋商於此間者，皆非有大資本營大事業，不過專辦本國日用飲食之物，售諸工人以取利耳。故工人來者少，則商店自少；工人困苦則商利益微。吾所至夏威夷澳洲各地，皆同一現象，而加拿大為尤甚。

哥倫比亞省之工人，以做沙文魚為最多。計每年魚來時，業此者每月可得美金三十元至六七十元不等。然每年惟四月至七月為魚來時節耳，自餘數月，凡業魚者皆無所業，束手坐食。故歲入恆不足以自贍也。

日本人在此者，亦以魚為業。然日人則採魚也，華人則製魚也。採魚每日每人工價優於製魚者數倍。然此地西人限華人非已入英籍者不得採魚。故雖以此區區之利權，亦不得與他族競。

製魚業外，惟有廚工洗衣工為大宗。廚工最上者每月可得美金七八十元，最下者十餘元。洗衣工工價甚微，大約每月美金十餘元。滿地羅洗衣工最多，以其地為加拿大之最大都會也。其餘尚有採礦工、伐木工等，然不多。合觀哥倫比亞省之商業（專指華商），域多利埠商店百四十餘家，溫哥華五十餘家，紐威士綿士打二三十家，其數不可謂不盛。然而西人貿易者，不過一二家耳，其餘皆恃華工以為養者也。中國雜貨店，居十之七八，而域多利埠則以製鴉片為一大宗。蓋鴉片入口稅輕，易於牟利也，但所牟者亦皆華人之利而已，大半銷入美國。近則美國查稅極嚴，故所銷歲減。其餘則洋服裁縫店有十餘家，稍爭西人利益於一二而已。

商於此者以賭博為一專門業，幾於無家不賭。以區區之溫哥華埠，而番攤館有二十餘家，白鴿票廠有十六七家，他埠亦稱是。吾常稽其每月銷費之數，每一番攤館受工者約五六人，每人每禮拜薪工美金六元內外，每館地一間租錢每月約美金四十元，通計溫哥華攤館每月之支費，約在美金六千元內外，為中國通用銀者萬二千元矣，每年當銷費十五萬元矣。白鴿票及其他雜賭之銷費亦稱是。是每年溫哥華一埠之資本蝕於賭者將三十萬，合計哥倫比亞全省，歲蝕至百萬矣。所生之利，不足以償所分，華人生計之日困也固宜。

日本人亦最嗜賭，聞其每年輸與華人者約在美金十六萬元云（溫哥華一埠）。此亦爭外利之一道歟。噫！

日本人之不能商務，尤甚於中國。計日本在此者殆四千人，而無一稍完之商店。吾昔曾至木曜島（在澳洲之東北隅）見其地有日本人二千而極富，有中國人不滿一百而頗富。詰其由，則此數十中國人即持彼二千餘日本人之貿易以致富者也，而二千日本人中竟不能立一商店，因疑華人商務之天才過於日人遠甚，今觀此地益信。

雖然，華人商務之天才，只能牟本國人之利，只能牟東方人之利，然與歐美人相遇輒挫敗，則有此天才而不知擴充故也。

兄弟之間

—魯迅與周作人—

一丁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魯迅從北京動身回紹興，結束了新台門的故家，遷移到北京去。魯迅是一家之主，按照新台門的家風，他有責任照顧家計和全家老少的安危。

這時魯迅頗有入不敷出的情形，他不斷的向朋友借貸，一有收入，立即還清。有時須向義興局出利息借錢。

「一九二〇年一月六日，午後往本司胡同稅務處稅房契，計見泉百八十。

二月九日，還齊壽山所代假泉二百，息錢十一元七角。

十六日，還齊壽山所代假百元。

十七日，還齊壽山所代假泉二百，利泉八。

三月四日，午後從齊壽山假泉五十。

三十日，午後從戴螺鈐假泉百。

三十一日，甚疲請假。

四月十日，上午收三月上半月奉泉百廿，還戴蘆鈐百。

十六日，晚庭前植丁香二株。

二十一日，上午收上月所餘奉泉百八十，還齊壽山五十。

二十五日，星期休息。午後同母親，二弟及豐遊三貝子園。

五月十六日，沛週歲，下午食麵飲酒。

十九日，沛大病，夜延醫不眠。

二十日，黎明送沛入同仁醫院，芳子、重久同往，醫云肺炎。午歸，三弟往。下午作書問三弟以沛狀，晚得答，言似佳。

二十一日，上午往病院。

二十二日，在病院。托二弟從齊壽山假泉百。

二十三日，星期休息。在病院，上午一歸，晚復往。

二十四日，在病院，沛病甚劇。

二十五日，在病院，晚歸。夜半重久來，言沛病革，復馳赴病院。

二十六日，沛轉安，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七日至六月十四日，有十五天「夜在病院」，其他數日，無日不去病院。對於一個週歲的姪兒，看顧得直是無微不至，七月十三日，沛退院回家；十五日，沛腹瀉，十六日復入院。十八日，因直院戰爭，「消息甚急，夜送母親以下婦孺至東城同仁醫院暫避。」十九日，「上午母親以下諸人回家」。這期間魯迅不斷向齊壽山借錢，幾十元不等。



1927年攝於廈門的魯迅

照魯迅日記所載，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晚馬幼漁來，送大學聘書」。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午後往大學講」。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午後往高師校講」，自此他在餒事之外，從事教學工作。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晚收大學九月、十月薪水共泉卅六」。可見當時大學講師待遇之低，也許魯迅所開的課時間不多。

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作人生病進了山本醫院，魯迅又不斷去醫院看視，又不斷向齊壽山等人借錢，四月十二日，「下午托齊壽山從義興局借泉二百，息分半」。直至五月四日，「上午齊壽山來，同往香山碧雲寺，下午回」。二十七，「清晨携工往西山碧雲寺，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後回」。六月二日，「下午送二弟往碧雲寺，三弟、豐一俱去，晚歸」。嗣後又不斷的去西山，替作人買佛經，付房租，代寄稿，前後達五個月之久。

作人「回想錄」說：「我於六月二日搬到西山碧雲寺裏，所租的屋即在山門裏邊的東偏，是三間西房，位置在高台上面，西牆外是直臨溪谷，前面隔着一條走路，就是一個很高的石台階，走到寺外邊去。這般若堂大概以前是和尚們『掛單』的地方，……我把那西廂房一大統間佈置起來，分作三部分，中間是出入口，北頭作為臥室，擺一張桌子算是書房了，南頭給用人王鶴招住，後來有一個時期，母親帶了他的孩子們也來山上玩了一個星期，就騰出來暫時讓她用了。」

我住在西山前後有五個月，一邊養病，一邊也算用功，但是這並不是什麼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學習世界語，翻譯些少見的作品。後來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從世界語譯出的小說，即是那時的成績；可是更重要的乃是後來給愛羅珂做世界語講演的翻譯，記得有一篇是『春天與

其力量」，說得空靈巧妙，覺得實在不錯。……在五月與九月之間一總給孫伏園寫了六回的『山中雜信』……」。

作人的文章以悠閒著名，從他在西山養病的記載中，他沒有一個字說到魯迅的「勞瘁」。

作人從西山回家，據魯迅日記，是九月二十一日。但可怪的是十月十九日的日記：「還二弟買書泉六元」，是不是從此時起，他們兄弟之間的經濟已經分開了？我們無法得到其他旁證。一九二二年的日記遺失，現在所刊者，係據許壽裳的手抄片斷補入。可注意者，正月二十七日記云：「舊除夕也，晚供先像。東邀孫伏園、章士英晚餐，伏園來，章謝。夜飲酒甚多，談甚久」。二月二日：「……又買泥製小動物四十個，分與諸兒。」可見他對於「祖先崇拜」，並不實行「思想革命」；而對於小孩子們的眷愛，永遠不衰。

十一月十四日，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到北京，住在魯迅家中，備受他們兄弟的照顧，直至第二年四月十六日，才回蘇聯去，中國的留蘇學生曾在東方大學見過他。

魯迅譯了「愛羅先珂童話集」和「桃色的雲」，為當時的青年所愛讀，筆者當時曾從他那悲憫反抗的希望裏得到鼓舞。

魯迅的小說「鴨的喜劇」，就是描寫住在他家裏的愛羅先珂的，「伊和希珂先，沒有了，蝦蟆的兒子。」這句描摹孩子口吻的話，是最生動不過的，讀了使人想像到一切都漾溢着詩的意境，和魯迅，愛羅先珂，天真的孩子，作人夫婦那種情景交融的胸懷。又誰知三個月之後，這種胸懷意蘊不再存在了呢。

這三個月中，我們從魯迅日記中找到下列記載：

「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下午伏園携惠迪來，因並同二弟及豐一往公園，又遇李小峰，章矛塵，同飲茗良久，傍晚歸。」



《祝福》插圖——祥林嫂

五月一日，晚與二弟小治肴酒共飲三弟並邀伏園。

十三日，星期休息。午後與二弟應春光社約談話。下午中央公園會三弟及豐九同飲茶。

二十六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澤邨、九三、耀辰、鳳舉、士遠、幼漁及我輩共八人。

六月二十六日，往祿米倉訪鳳舉、曜辰，並見士遠、尹默，二弟已先到，同飯，談至傍晚始出。

七月三日，與二弟至東安市場……」

十四日的日記，忽然出現了不同的調子，記着下列字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看來似乎寫得一樣神定氣閒，但熟知他們兄弟之間友于之情的，這樣的句子，確乎是驚人心魄的了。

「十九日，上午啓孟自持信來，後邀飲問之，不至。」

這封信的內容，魯迅與作人從未披露過，據許廣平後來的「魯迅回憶」中所說：則是信封外面寫着「魯迅先生」，裏面斬釘截鐵地要魯迅「以後不要到後邊院子裏來」。

於是魯迅被迫要搬出八道灣了，他的日記說：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往磚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書箱入箱。」

二十九日，星期休息。終日收書冊入箱，夜畢。

八月一日，午後收拾行李。

二日，下午携婦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

魯迅和作人失和，只苦了他們的母親，她兩頭奔走，兩個兒子誰也丟不下。

「八月五日，晨母親來視。」

十三日，母親來視，交來三太太箋，假十元，如數給之，其五元從母親轉借。

十九日，上午母親來。

二十一日，午後母親往八道灣宅。

二十二日，上午得三弟信並家用十五元。

二十六日，上午母親遣潘媽來，給桃實七枚。三弟之款即令將去交三太太收。

二十九日，上午母親來，交三太太信，並所還錢五元。即以泉還母親。

三十一日，上午母親往新街口八道灣宅去。

這樣的記載，多至引不勝引的，但他母親病了，看醫服藥，都是魯迅的事。

「九月十六日，三太太以信來問母親疾。」

十八日，上午同母親往山本醫院診。母親往八道灣宅。」

這期間，魯迅不停的看房子，借錢，可是他也病了，從十月三日以後，至十一月八日為止，他的病大概非常纏綿，八日記：「夜飲汾酒，始廢粥進飯，距始病時三十九日矣。」他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給母親信說：「男所生的病，報上雖說神經衰弱，其實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經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灣趕出後的一回，和章士釗鬧後的一回，躺倒過的，就都是這病……。」

編者的話

▲移民局在一九七五年發表了那份各方矚目的移民政策綠皮書，並公開徵詢意見，作為製訂移民政策的指南。部份旅加華人團體亦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在溫哥華召開一次研討大會。去年十月，本刊邀請了八位與會人士參加本刊編輯委員會主持的一個名為「移民、移民政策、華人、多元文化及其他」的座談會。被邀請的除了當日出席的四位外，還有多倫多華人研究移民政策委員會主席簡家聰律師（簡律師當時身在香港，未能出席），多倫多大學中國同學會應屆會長黎國燦君，陳世超君和一位曾經參加華人代表大會的工友，後三者沒有到會。

▲「我對全加華人代表大會及移民政策新方案的一些體會」是一位曾經參與是次大會的朋友給我們的來稿。他對大會的看法和感受給這次大會進一步提供了新的資料。

▲魁北克省的政治形勢，一直是關心加拿大聯邦體系的人所注目的問題。去年發生的雙重語言和魁北克人黨在省選舉中獲大勝事件先後引起加國社會輿論界一陣子的騷動。於天君在「加國『兩種國家語文』的問題」裏給大家分析了「問題」的所在。魁北克究竟會否仍是加拿大聯邦政制內的一個成員或是將會脫離聯邦而自成一國？仁君的「魁北克省……魁北克國？」是以他那職業記者的文筆，報導魁北克人黨獲勝的前後經過。

▲華資近日大量湧入北美洲各地的唐人街，去年年末多倫多市數間斥資頗巨的飲食業行館開幕反映了這個新現象。「採訪多倫多華商會簡報」是本刊給讀者提供有關多倫多唐人街最新的經濟動態。

▲經濟這個問題看似平凡，實則關係民生至大。何澤生君將以連載的方式，深入淺出地給大家介紹一些基本的經濟常識。

▲前人常謂「以古為鑑，可知興衰」。早期旅加華僑的生活史可以說是「一把辛酸淚」。本刊將晚清學人梁啟超的著作「新大陸遊記」節錄連載，目的是希望新一代的僑胞們認識前人的艱苦，從而得到教訓。

▲有人說政治是黑暗的；有人謂「仕」途是易變幻的。這祇不過是對政治患有恐懼病或是對它認識不夠的人才會如是說。去年十月後中國領導階層內發生的劇烈轉變是有着其歷史因素的。「四人幫 垮台的前因後果」羅列了這次事變的成因和作了保留性析分析。

▲殖民地教育政策一方面製造大批順民，一方面又培養出小部份的特殊階級。關於「發展中校教育」批評了香港教育司署對待私立學校的態度。

▲喜歡看有一定水準的電影的讀者欲知在那裏可以看到好的影片，請參考夸父君的「看電影往何處去」。金帛、向東、綠茵、方君、癌石、二了諸君皆為旅加華僑青年。他（她）們在文藝創作上的努力，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華僑年青一代旅加的心態。

▲海外述林籌辦了四個多月，在倉卒間收集了創刊號的文章。這期間，朋友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寫在紙上，便成為今期論壇版的兩封來信。編輯委員會各成員辦刊物的經驗不多，除了滿腔信心外，同寅希望在讀者的反應和批評中得到教訓和鼓勵。誠如發刊詞上所說，海外述林是一份公開的刊物，讀者對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有更深入的认识，不妨來信提出，大家一起討論，這樣才可以達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目的。

×

×

×

海外述林

The Crossroads

VOL. 1 No. 1
JANUARY 1977

定價：加幣 75 ¢

第一卷第一期（總第一期） 1977年1月號

編輯：海外述林編輯委員會

編輯部地址：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二〇五號二樓C座

電話：1-416-598-0296

海外述林總發行處：

思雅書舍

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
二〇五號二樓C座
電話：1-416-598-0296

Editorial

In this first issue of Crossroads, it might be appropriate to make a few comment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journal and its two constituent parts: the English and the Chinese sections. The bilingual format is an experimental idea and like any experiment, there are problems as well as aspirations. Crossroads was first conceived by a group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s a unilingual journal whose target audience was to be the newly immigrated Chinese Canadian. Since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newly arrived immigrant retained a strong sense of affinity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journal collective were more comfortable working in Chinese, there was no need to go outside a strictly Chinese language format. But during the period of preparation for this first issue, the initial editorial collective grew to include members who brought forth new ideas and suggestions pertaining to the format and audience of the journal. That the collective now consisted of a group of Chinese with a wide range of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is indicative also of the diverse natur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deed, the Chinese Canadian is not only the newly arrived immigrant, but the immigrant whose presence goes back many generations. Despite these differences however, the journal collective feels that there is a sufficient common basis in both raci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to justify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se diverse expressions into one journal. It is hoped that this might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for comparing social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well as foster a continuity in cultural expressions. The journal therefore is necessarily bilingual in format.

With this first issue, the English section appears to be an appendage of the Chinese section. Thi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late date with which the English section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editorial collective's policy. It is hoped that our readers -- especially those whose working language is English -- will respond to and contribute to the expansion of this section!

One of the primary concerns of the jour-

nal is to focus on issues and events which are relevant to the needs and concer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on both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We hope to maintain a system of analysis which goes to the roots, exposes the circumstances and analyses the meaning of events which affect the daily lives of Chinese Canadians.

We recognize that Chinatown consists not only of restaurants, grocerias and curio stores, but more importantly is an expression of a complex constellation and a unique structure of a particular layer of society. Economically, Chinatown not only provides its members with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ment, but is closely related to and competes directly with the indigenous financial structure of the large socio-economic system. The survival of Chinatown has always been contingent upon the fluctuations of this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influx of overseas merchants has established a thriving business community in Chinatown. The result is intense economic competition which has rapidly altered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landscape of Chinatown. We aim to report and analyse on a continual basis, this important phenomenon.

For many, the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has bridged the distance from being thought of as 'alien and unassimilable' to being called North America's model minority. Their acceptance and absorption into the mainstream of life has been so markedly smooth and without incident, that the Chinese as a result is not only known as the model minority, but the silent minority.

However, Crossroads also recognizes that other Asian groups share many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s and concerns. While Asians reflect a wide range of backgrounds and commitments to North America, there can be found a common level of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with which all Asians can identify. Therefore, when we address ourselves to certain issues, we commit ourselves to the defini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a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that is not only Chinese, but Asian North American.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he progress of Asians, the Chinese among them, has always been gauged by the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larger social structure and while a sizeable number of Asians have achieved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job employment and financial status, at the same time, many are kept back because of discrimination and built-in institutional inequalities. Certainly this success story places Asians ahead of some other minority groups, but it has been at the price of great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dislocation. If North America has written the Asian success story, it has largely ignored the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of our forefather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continent and done much to distort the Asian sensibility.

While a plethora of books, articles and documents tell us that the Oriental is inscrutable, hard-working and as sojourners, wanted nothing more than to return to the East, we at Crossroads have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we recognize that we must disentangle the myth from reality if we are to begin any discussion of an Asian North American identity. Our assertion of an Asian North American consciousness no doubt conflicts with the scores of myths that people harbour about what an Oriental is like. Asians must confront and expose the myths and distortions that are perpetuated in all forms of the media and the arts in order to locate and articulate a uniquely Asian North American identity which has roots here in North America.

These are crucial times for Asians and Crossroads recognizes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seal of silence be broken so that Asian voices can rise up in all their glory, anger and despair.

Conversation with Canadian students returned from China

At the end of last October, several of us from the Crossroads editorial collective spend a pleasant morning talking with five Canadian students who recently returned from study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For many of us, the idea of an extended trip to the 'land of magic' has been for many years, an unfulfilled dream. So we thought an interview with the return students would be both desirable and appropriate for the Crossroads journal. Desirable for the obvious reason of interest and appropriate for the comparative light they might throw on the nature of both the Chinese and Canadian society.

The five return students are part of some forty Canadian students who have studied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as the Canadian representatives in the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between Canada and the PRC. This arrangement was first started in November, 1973, a product of nearly a year's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As students in China, they primarily studied Chinese language, although limited opportunities were available for individual research into particular topic of their own design. As a

general rule, the students usually stayed for one or two years, studying at the Peking Language Institute, then either at Peking or Fudan Universities.

The students had an option to renew stay after the initial two-year period. In between studies, during study breaks and summer holidays, the students had extensive travel opportun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From their studies in Canadian universities, the students had previous knowledge of China prior to their trip. They are therefore not the four week package tourists we usually hear so much about nowadays. It was simply a delight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of gathering so many knowledgeable persons simultaneously for a meaningful exchange about the PRC.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space to extend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for their kind co-operation in consenting to the interview, also for the good humour they showed towards the insipid coffee we somehow managed to provide for their reception. The five interviewed were Tim Brook; Lionel Clar; John Helliker; Margaret Small; and David Zweig.

Q. What was your mental attitude like before your China trip? What sort of ideas did you have about China prior to your going?

David: As I looked back at my diary,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that I had this idea that we had to fight hard to get anything that we wanted (chuckles) I was criticized the whole time there for always fighting. Partly it was because of my impression of China and the exchange program was affected by a conversation I had with one of the Canadian students who had just returned from China via Hong Kong, who was very negative about his whole experience. Another thing was the John Burns article which brought out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by Canadian students in making contacts with the Chinese students. So it was my impression there were lots of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opportunities of meshing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you would have to really press for the opportunities. Although knowing there might have been inaccurate ideas, they nevertheless did color my attitude about China.

Margaret: But of course we must remember that it was just after the first year since the program had been in operation,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following years. We did have to push for some of the things we wanted, primarily for closer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For instance, I had expected a Chinese roommate before we arrived, but instead I had a Guyanese roommate. It was nice that I learnt about another country, but it wasn't China. So the first years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latter years. In later years, we had Chinese roommates. We were an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ose early years.

Lionel: Perhaps it was a situation that as foreigners in China, we all had expectations and needs to be fulfilled. Unfortunately, some of us held the attitude of "seek, ye will be given". We must remember the first year was an experimental situation, neither the Chinese nor the foreigners had much

experience in setting up the program. In such circumstances, it was best not to take an adversary attitude which some of us did unfortunately have, but instead a co-operative and working together attitude. True, it was a foreign country and a foreign school, but it was set up for us. It was for us to get involved with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the desired changes. Once we did, the later years were a growing together experience.

Q. Did your academic training prepare you adequately for your experience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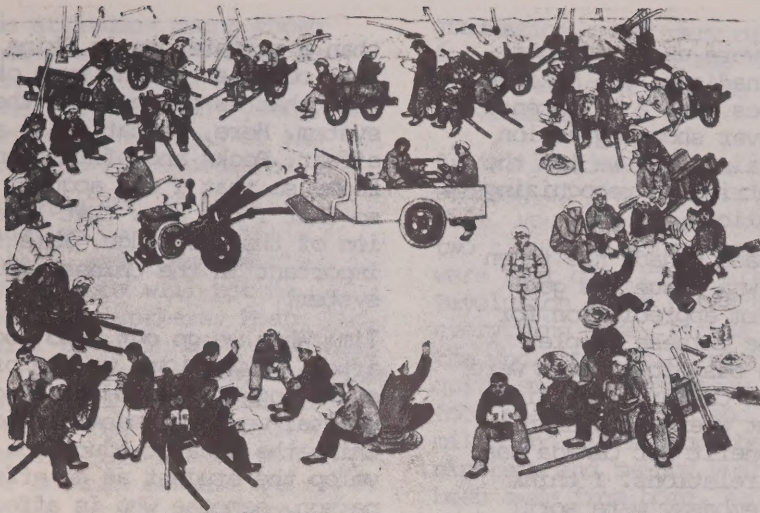
John: I don't think so, taking courses on China in university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living in China itself. The courses gave me somewhat of a perspective, but in terms of what is really going on there, it's very inadequate. I remember my own initial feelings about the trip was that I was just going to experience another culture, which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Canada. I wasn't prepared for a China which is undergoing a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radical social changes.

Q. How did you manage to make connection with your Chinese hosts? Were there some ways better than others? On what level was the connection made?

Margaret: I think David and I found that the best way was through sports. I used to be in the swim teams, David in the basketball team. John and Tim too ran in the track teams. On this level, although we were foreigners, we were part of a team. The feeling of belonging to the same unit brought the Chinese and many of us closer together.

Q. Were there relationships made outside the organized activities on a more informal level?

John: I think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rganized relationship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 outside organizations is a false one. For example, we could talk about our relations with our roommates and classmates as being organized arrangements. True, it is an organized setting, but within that,



we had varying degrees and level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idea that things were set up and pre-arranged before one could have any degree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is or that Chinese person is simply not true. It all depends on what they want and what we want too.

David: The point is that within organized structures, one can still pick and choose. No one felt that they had to be his or her friends. But I think the point should be made too, is that outside those particular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interactions, if you try to go outside those frameworks and try to make contacts, those contacts could not be supported. Like, you couldn't expect to meet someone on the street and be expected to be taken home. Another thing is that even within the school, sometimes if you didn't have a reason for getting to know someone, then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either of you to pursue a relationship.

Margaret: You have to realize too, that the situation is very often similar with the Chinese students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work within these units, they get to know people within these units, people with whom they have some things in common, some common projects. My Chinese roommate once told me that her friends are mostly people within her department. So we can see that is is not unusual for us not to have friends outside these units.

Lionel: It is the same situation here in Canada too. Personally, in all my years since my return to Canada, in fact, I cannot remember a single person who has tried to befriend me on the street — in fact, here it is even difficult to get to know your own neighbours.

Margaret: On the other hand, as foreigners in China we invariably attract attention on the streets. I remember once I was walking on the street in Peking and some little old lady behind said 'and where are you from?' I turned around and said 'Canada'. As she said 'Oh, we grow Canadian tomatoes here'.

Q. Do Canadians stand out among the foreigners in China? Are Canadians more unique in Chinese eyes?

Tim: Since every Chinese knows Norman Bethune, this always becomes the first point of contact. They'll say 'Oh, you are from the Bethune country'. And that in many ways, generates a warmth for conversation. The Chinese also know that China buys our Canadian wheat. The Chinese have perhaps, more individual facts about Canada than they do about other countries.

Margaret: The fact that Canada has never been an imperialist country also helps. I remember once going on a field trip. There were three buses to take us there. On the first bus, were students from imperialist countries and

on the second bus were us funny lots, the Swedes, the Canadians, the Mexicans, etc. I think it does make a difference that Canada has never shown aggression towards China and also that we led the first wave of countries in recogniz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David: Also the stand Canada has taken on the Olympic-Taiwan issue has generated a lot of warm appreciation for Canadians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Our fellows in the basketball team were really proud of our Canadian position and told us so. But where this didn't have any direct benefit for Canada was 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I think the people in the embassy were sort of expecting reciprocal returns on a lot of things they were pushing for, such as exchange programs, trade, etc. I don't think this had much effect.

Q. As all of you have had the unique opportunity of having studied in two different educational systems, I'd like you to compare the two systems in terms of aims, methods, the forms and contents, etc.

John: Tim and I were talking about graduate schools the other day and I said it's a frustrating experience in coming back for graduate school in Canada. I found myself going to classes everyday just to sit there and listen to some guy lecture to me. And then I go home and read books. In China, the emphasis is on collective discussion rather than lecturing. As a resul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is a lot of emphasis on practical training too. For instance, students in Tsinghua University might be involved in designing a dam. But the dam will actually be build for the use of a nearby commune. They will do practical work there in helping to build the dam and then go back to the classroom as a group to discuss and further work on the project, maybe to improve the design. In this way, what is involved is both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also group interchanges of knowledge. I think the idea that knowledge being viewed as a collective thing rather

than a private one in China is a real contrast to the type of education that is going on in the Canadian system. Here, education is a private affair. Books and information are fed to me so that I can acquire knowledge so that I can show that I have possession of the knowledge. This is not what's important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Tim: When we go out into society here after graduation, we are often hired according to the kind of educational capital we have amassed, whereas in China the idea of education is to develop the student as an effective person, someone who is effective in the practical world.



Lionel: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which illustrat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education. For one thing,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here in Canada is really ultimately determined by whether one can afford to pay for it; whereas in China it is not even principally one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bility so much as the political criteria which determines the eligibility. The people who go to university in China are selected by their workmates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criteria. Secondly, education in Canada means usually a tool for social advancement; whereas in China, after their studies, the graduates usually go back to their original work place to become more effective producers, to be more effective practically, and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leadership.

Q. What are the attitudes among those university graduates who had to go back to their original work place in the factories or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Do you detect absolutely no signs of the slightest hesitation or reluctance?

Margaret: In fact a lot of them are indeed very eager to return to their original workplace, even permanently. But though most of them will not be returning as ordinary workers. Most likely, they will be assigned leadership positions, but this doesn't mean that they will not be involved in actual physical work. It only means that because of their educatio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responsible for leading educational groups, discussion groups and so on.

Lionel: I know a Chinese student who had graduated in history and the original idea was for him to return to his commune in the countryside. Instead, he got assigned to the Academy of Science in Peking to do research work in history projects. He was very upset. I saw him several times after he had gone to his new job. It took him several weeks of thinking to get settled and reoriented.

Q. I wonder though, if you are not painting too homogenous a picture and neglecting your own caution some time ago that China is too large and diversified a country not to prove some exceptions to any generalization one might make. In fact, my impression is that the whole business of sending back students to their original work units did encounter some difficulties. Maybe not so much with the university educated youths, but the highschool graduates who were sent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after their graduation. Some in fact did secretly return to the cities and created a nuisance. The Chinese call them (social juveniles). How wide spread is this phenomenon? Maybe this is more wide spread in smaller centres?

Margaret: I don't think this is a very wide spread phenomenon. There has been some problems with the kids who go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after their highschool

graduation. But very often they just go for a year or two, and new batches are constantly sent down to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s.

David: I think when we talk about the sending of youths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you almost have to look at it as two time gaps. There were those that were sent down righ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 bit after that. Like everything else, it was a new thing and the whole operation might not have been quite smooth. What they did was they took masses of kids and sent them down miles and miles from their home. Eighteen, nineteen and twenty year olds who had never been away from home, had been brought up close to their parents, so naturally they wouldn't have known how to relate to the whole thing. The peasants didn't know how to relate to the kids either. All of a sudden there were these young city kids living in their homes, who knew precious little how to work in the fields. But for a peasant, growing grain was their livelihood and survival. And now you're feeding an extrad mouth, who can't even te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ve grain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naturally this led to a lot of mental hostility. What seems to have come about through the re-examination process was that it was made known to anyone who goes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from the cities, that there is a good chance to return to the cities after on to no more than three years. Also, they have now got thirteen youth state farms outside Shanghai and we saw some outside Chengsha for the city youth to go to. This certainly improves the situation a great deal. Now they are no longer confronted by an older group of peasants whom they have difficulty relating to. Instead they are working with people of their own peer, which creates a much better spirit. I think the tendency now is to send people to nearby places outside the major cities. You don't get that big push miles and miles away, which makes the whole experience much easier for the youth to absorb and relate to.

Q. While we are on this question of relatedness and the goals of education, how do you relate your own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school system to the one that you have returned to? Are there things you learnt or observed in China which you think might be relevant to making suggestions for the Canadian educational system which as we all know is undergoing convulsive changes both in the questions of relevancy an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society?

Tim: The basic problem you are confronting here is that you hav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ocietal structure, an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reflects the societal structure. We could make some kinds of smaller suggestions in which the Canadian educational system could modify itself. But what's needed is a complete societal change before any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could come about.

Lionel: The difference is that either you have an educational system devoted to private interest or an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is devoted to collective interest. You can't take a different educational system and graft it onto a different society.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China serves the collective interest because it is a socialist country.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Canada serves private interests because it is a capitalist country. There are a lot of little ways you could tinker with reformist measures, but there wouldn't be any point to it simply because the system is geared toward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goals. Like, it would be absurd to send our professors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for three months for instance.

John: You could reform the Canadian educational system and make it look like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in appearance. You could have people going out and be involved with practical activities; for instance, to go to the GM plant and examine its operation in order to help them design a new speed up system etc. What good would that do? Yeah, the basic thing is a change in the social systems. Whatever reforms that could be carried out here, those same reforms can be used by the ruling class in Canada to serve their own purposes. So unless its a more basic change, it remains the same.

Lionel: There are already a lot of areas here in the Canadian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are really practical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ocial goals. For instance, people go to medical schools and learn to be god; people go to law schools and learn to be politicians; people take commerce and business courses to be junior executives and so on. So it is all very practical and there are particular social goals that are being fulfilled by universities in our society, but then those are very different goals from those of China's.

Q. Yes, I think here in the west, the logic of our social goals have not been clarified as they have been debated in China. The whole trend of narrow specialization both within the universities and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is responsible for a great deal of dissatisfaction and alienation experienced by both students and workers alike. I think this process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might also become problematic in China with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hen the demands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calls for more specialization. How will China solve this problem?

David: Yes, the whole question pertaining to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is a constant theme in China. While China may be trying to allow a person in his own field of learning to focus in depth on what he is doing, China is never forgetting the perspective that the basic way to develop the society is to overcome the rigid division of labour. The trend in our society is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specialization and technic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whole bureaucratic tendency as Weber foresaw. At the same time as China needs to develop technologically, it also faces the same problems that these trends exist. But unlike our society where these trends develop with increasing momentum, China is aware of the dangers of where these trends might lead to and is taking conscious steps to overcome that. Like, John was in a factory in China and the worker he worked with knew Western literature, some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was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This shows you what the Chinese are aiming to



do though they are confined within the technological necessity of narrowing a workers scope in pro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want to broaden him as a person, to overcome this narrowness that comes naturally with the tendencies of industrialization.

Q. What did the foreign students do during political campaigns? Were you able to participate in any way? How did the foreign students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relate to each other during the campaigns?

David: As far as person to person relationship is concerned, it was rarely or never affected by political campaigns. During the criticize Teng campaign for instance, our Chinese roommates knew that we had organized a group for studying and systematically copying down the 大字報 (big character posters). Some of our roommates were a little bit unsure of what we were doing, but they weren't really nervous about it. In fact, they probably looked at it as another way of getting out the information, they didn't seem worried about it. While we were copying, people who were on duty in the compound in fact were very helpful in pointing out some of the characters we weren't familiar with. In fact,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probably brought the foreign and Chinese students closer together in terms of our showing interest in what's going on, showing enthusiasm in wanting to be part of it and so on.

Q.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Teng Hsiao Ping was certainly an intriguing one. His meteoric rise in the hierarchy, especially after his downfall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probably as dramatic and abrupt as his sudden departure recently. We in the West were certainly puzzled and more than a little surprised by all this zig-zag of his political fortune. Did the Chinese people appear puzzled at all by the whole business of Teng? Did the Chinese students grasp what was going on?

David: First of all, when the campaign started, it wasn't directed at Teng. It was a campaign to criticize the educational minister Chow Yung-khan (周榮金). As to whether the students understood what was going on, I think they certainly did. You have to realize



that I was in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My roommate was a party member, he was the monitor (班长) of his class. So, as far a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s concerned, he was certainly one of the important persons in the school. They had been down to a factory in August 1975, and they had found that material incentive was being used in the factory. The rumour that had been going around was that Chow Yung-khan made a trip in the summer of 1975 to different schools and said certain things and ideas that were obviously antagonistic to Chairman Mao's revolutionary line of education. We wouldn't have picked up on this. But I think the Chinese students knew a fight was going on. I am sure that people who had a certain level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struggle knew that there were two sides to it, that Chow was not getting away with this on his own. Although the Chinese students denied that there might be a bigger fish behind the criticize Chow campaign. I think they knew clearly, especially those who had been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eng was behind all this, or someone else high up was behind it.

In the present Chinese society, I would say that depending on what kind of job a person holds, his interest would affect his politics. I know at least two Chinese people who would cheer loudly at Teng's return. One Chinese person told me that Teng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could develop the economy and at the same time follow Chairman Mao's revolutionary line. That was the summer of '75. And then after Teng was thrown out, I knew some Chinese who said very plainly that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sciences were not thrilled that Teng had gone. They thought he was doing a good job and that it was good to have him around. I think he has a fair amount of support in certain segmen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ere we live, among the Chinese students, it is said that the struggle within the superstructure, the struggle of ideologies was the main thing, they would really be glad to see him go. But for people who are more involved in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things, the reaction would be different. If you had gone down to Tien An Men on the day of the riot and saw which groups were bringing out the wreaths, which groups were out on mass, you would have seen the trade ministries, the science academies,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ies etc.

Q. Differences within the Chinese polity certainly exist, but I am sure you will agree with me that these differences must be seen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unity and cohesion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which is more fundamental. Though I am wondering if you could locate the sources of division within the Chinese society. How valid is the observation that places the division as between the technocratic and the ideological sectors in the country?

Lionel: Certainly there is validity in this kind of division. I think eventually you have to see it as a class division and class struggle as they say it is. I think

we have to try to see what this means in terms of a socialist society where you don't have capitalists actually owning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s a class. They talk about the most difficult obstacle to building a socialist society is capitalist roaders inside the party. The social reasons being that there are people with opposing views as to how the society should develop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No question about that. So one of the fundamental lessons probably we have all learned is that it is really true that class struggle does exist and manifests itself in all sorts of different ways.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the division within the Chinese society. But yes, so far the sense of cohesion is the primary thing. There is a fundamental feeling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masses that for the last fifteen years, they have really been engaging in building socialism and that they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else.

Q. 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recent political storm around the 'Gang of Four'?

Lionel: One small observation I can make is that from the little letters I've been getting from friends who are still in China, the impression I got is that in comparison to the criticize Confucius, criticize Lin Piao campaign, the criticize Teng campaign, the arrest of the 'Gang of Four' is the best thing that came along for long time.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is an awful lot that is going on which does not meet the eyes and we would have to wait many years to find out. But the popular notion that is circulating around in this society at present is that now that the radical four are gone China is going to be less communist. This, I think is a very wide spread illusion.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riticisms made by the Chinese about the 'Gang of Four' is that they do not se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revolution and production. But a lot of people, like the journalists are saying there is going to be moderation and they

are going to concentrate on production etc. But you know, that is precisely the one-sided error they claim the 'Gang of Four' made -- that they did not correctly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with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over-emphasizing one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 And that's not moderation to correct that kind of error.

Q. What aspect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ffected you most? What did you carry back with you to Canada from your study experience in China?

David: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affects you most when you go over there is to see a poor country that is conscientiously trying to change their society. Whether you see it as a Marxist or just a person who likes to see people have a better standard of living, you are bound to be affected by the fact that on that side of the world, there is this mass of people who are really working their hardest and trying their best to get together a good and proper way to develop that society. It is then very sad to se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other places in Asia for example, that are not getting anywhere and do not seem to be trying very hard. Then you can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at country there that is making these people really work to improve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their lifestyle, their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ther. And I think there is a profound effect on oneself when one returns home. Another feeling you carry with you when you come back from China is a desire to try to make the people in Canada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At least for the next little while, this is where I see myself as best fitted to devote my energies into, to bring about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As this article is being written, the latest news concerning the 'Gang of Four' in China is that the central leadership in China has just issued a call to deepen the campaigns against the 'Gang of Four' and their followers around the country. On December 26, in his speech to the Second National Tachai Agricultural Conference, Chairman Hua Kuo-feng assigned "the mass campaigns to criticize and expose the 'Gang of Four' as the central task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n 1977." The other three major tasks are: (2) to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the party; (3) to work enthusiastically toward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4) to spread the study of Marxist-Leninism and the thoughts of Mao Tse-tung among the broad masses.

RANDOM THOUGHTS ON THE 'GANG OF FOUR'

The study of socialist theories is assigned the fourth pla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class struggle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these tasks was not stressed by the chairman in his speech.

Although it is now too early to comprehend clearly the exact meaning behind this new development, the announcements nevertheless signify a tremendous important beginning of a new s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two most crucial concerns of the announcements were obviously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Gang of Four' and their sympathizers and the approach 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years to come.

With regard to the first, all indications seem to point to a hardening of attitude and a deepening of the purge to eradicate the gang's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Globe and Mail reporter, Ross Munro, a survey of the most recent official news releases seem to reveal a lack of conciliatory sentiment concerning the method of struggle against political deviates.



The famous slogan 'cure the disease and save the patient' was conspicuously absent in the Chinese press. The Liberation Army Daily on the other hand, had been insisting that no mercy be shown the radicals because 'being benevolent to them would be a crime against the people'.

However, the general tone of Hua's speech to the Agricultural Conference was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and was marked by appeals to distinguish the two kinds of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ming struggle against the four and their follower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Gang of Four' is 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 between ourselves and our enemies. This point must be understood clearly. We must treat separately those who had mistakenly followed the 'Gang of Four'. Within them,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dark activities of intrigues were the minority. Those who we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our and committed mistakes were the majority. Even those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activities of intrigues, there is also a difference of degree. But no matter the extent, whether it was shallow or deep, if they clearly confess their intrigues to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drawing a clear lin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four, they will be welcomed by the people. The strike must be limited to the 'Gang of Four' and the small number of unrepentant gang members."

Now this is almost like a clear breath of air in comparison to the lurid descriptions of the personal 'crimes of the four', which have been the predominant tone of the 'revelations' in the Chinese press so far. The vituperative language and the bizarre exposures designed to denigrate 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gang have not failed to become sources of distress and discomfort for many here abroad who have longed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present struggle in China.

For one thing, the revelations raise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For those of us who for years have looke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its leadership for inspira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social and human progress, the accusations of autocratic

and extravagant living styles of the four unearthed by the purge came as a surprise and a profound disappointment. How on earth, we ask ourselves, could such monstrosities and anomalies have succeeded in climbing so high and retained their power of influence for so long in a socialist country like China? If all the accusations were true (and we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otherwise), we must conclude that there exists a tremendous distance between at least one segment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o find the same leadership who had championed the cause of anti-bureaucratism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ow accused of the very same crime simply adds to the confusion.

It seems that the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four is designed to isolate the four as much as possible, in some ways, using them almost as 'whipping horses' to unload on them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setbacks which have occurred in Chinese society recently. In his speech to the Agricultural Conference, Chairman Hua compared the four to scurrying rats which everyone would strike at unmercifully. This strategy of directing the fire at the four has unmistakable functions. First, it will limit and conta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Gang of Four' to within manageable perimeters, thus forestalling chaos. Secondly, the strategy is designed to completely denigrate the four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four in the future is totally unthinkable.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s also aware of the necessity of separating the four from their past associations with Chairman Mao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point 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irman and the four had not always been explicit. It is even fair to say that at least two of the four Chiang Ching and Wang Hung-wen got their positions partly through the direct sponsorship of the Chairman.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purge, the articulated policies and positions of the four were at least on paper, those expounded by the Chairman himself. The 'Gang of Four' might justly be accused of extremism and interpreting the Chairman's policies too



dogmatically, bu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find proof of their counter-revolutionary capitalistic tendencies from their theoretical articulation.

This also explains the caution with which the campaign has so far exhibited towards the criticism of the four's policy and theoretical positio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s only too aware that a full scale assault on the latter is also liable to touch upon the legacy of the infallible Chairman Mao. We can therefore expect that a systematic critique of the fou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will be long in coming. Meanwhile however, if the vehement attacks on the personal lives of the four does not subside, the accumulative effects of all such unprincipled revelations might have a deleterious effect on the struggle ahead. It is ironic that the present Chinese leadership insists o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four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two-line struggle in China

while the accusations heaped upon the four have so far been primarily revelations of wonton personal intrigues. However, in order to show the struggle as a class struggle, ultimately it needs to be based upon clearly defined political lines. In other words, the criticism must be directed at the four's policies in reference to the structure and superstructur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For it would be absurd to claim that the 'Gang of Four' and their fellow sympathizers simply conspired together to seize power for power's sake. There is enough verbiage of this kind in the western presses to interpret the situation simply as a struggle for power.

If one were to argue that the four were merely utilizing revolutionary slogans to camouflage their personal ambitions (as this is what most of the accusations have amounted to so far), then it is an argument which precludes any further discus-

sion. All demonstration to the contrary will be useless and out of context and besides, the accused four are not available for comment.

But if we were to examine the attitudes of the four towards such questions as material incentives, private plots, revolutionary criteria for arts and literature, foreign policy, etc., we will discover that the four articulated hard-line positions on all of the above questions. It remains to be demonstrated how in concrete practice the influence of the 'Gang of Four' i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was leading to tendencies of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t is one thing to criticize the four for failing to se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 between revolution and production, and quite another to accuse them of being revisionists plotting to restore capitalism. It will never be convincing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the cliché 'left in appearance, right in essence' is repeated.

There is no intention here to argue the case for the 'Gang of Four', for we also recognize the numerous mistakes the four had made in the past. Nor do we have any illusions about the four being the true inherito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o articulated the aspirations of the masse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upheavals of the mid-sixties.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behaviour of the fou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ll reveal both opportunism and flexibility of principles, which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y have survived as long and advanced as far as they have. But now with the four deposed, gone also is the last of the central leadership who had even remotely been connected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increasingly more rehabilitated cadres making a reappearance o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cene.

Lung Shu-jin (龍書金), Lee Jing-quan (李井泉), Wu lan-fu (烏蘭夫), and Yeh Fai (葉飛) -- only to cite the most prominent among them. These are either high ranking military leaders or provincial secretaries who have reasserted their presence since their downfall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short run, the demise of the four will certainly be received enthusiastically by the Chinese people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is signifies the relaxation in the incessant ideological struggle which the four is known to have pushed to some extreme. Their purge might also prove to be beneficial in terms of restoring a proper balance in the equation of revolution and production. Thus improvement in production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can be anticipated. But in the long run, the danger of falling into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socialist development also increases.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hairman Mao had wisely created a balance of forces on the two sides before his death so that there would always be a proper tension between revolutionary idealism and practicality. In this regard, Hua Kuo-feng was the compromise candidate acceptable to both sides. Mao probably would never have foreseen the rapid realignment of forces immediately after his death, resulting in the purging of the four and upsetting the delicate balance.

The purge of the four's influence will certainly be felt most strongly in the area of arts and literature and in many ways, will prove to be a positive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creative environment with less ideological rigidities. Many of the popular films, stage-works and songs which had been suspended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ve reappeared since the purge of the four. The popularity of this mov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within intellectual circles and the general Chinese populace. On December 7, Chou En-lai's widow, Teng Ying-chao had spoken of the possibility of reviving the spirit of the 'Hundred Flowers' to a visiting delegation of Japanese writers. Although the possibility will most certainly be contingent up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Gang of Four', this is a welcome prospect nevertheless.

MAY TIEN

CHINESE IN CANADA: FROM PAST TO PRESENT

For a race that represent less than one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no other immigrant group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so much legislative restriction or exclusion as the Chinese.(1) From their initial presence in the 1800's to at least the middle of the 1960's, private as well as governmental action has tried if not to expell, than at least to discourage the flow of Chinese immigration to Canada. Despite such hostile forces, the Chinese have managed to overcome these obstacles and straddled the distance from being the most unfavour- ed immigrant group to being called the 'model minority'.

Since the bulk of the Chinese in Canada at the time of their first arrival landed and proceeded to work in British Columbia, the focus will be on that province, as the distribution to other provinces was minimal due mostly to lack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 census taken in 1891 shows that of 9,129 Chinese in Canada, 8,910 were resident in British Columbia. (2)

It is estimated that sixty percent of the Chinese who emigrated to Canada from Toishan, a district in Kwangtung whose closest neighbour to the northwest is Canton and to the southeast Hong Kong, while a good proportion of the remaining forty percent came from surrounding districts. (3)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lux of emigration particularly from this area alone, an examination in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at prevailed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s necessary. China had been a semi-feudal society and a predominantly agricultural country.

Limited arable land space, a vast population coupled with a backward social structure meant that only one third of her population could depend on the land for a living. The feudal structure of the land system c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two factors. First, any gains the land-owners, farmers and peasants made in working the land were exacerbated by a usurious tax system and secondly the patriarchal Confucian tradition required that property be success- ively divided among male heirs which had the effect of fragmenting land holdings into smaller and smaller claims as it passed hands.

For the two thirds of the population who had to look elsewhere for means of survival, the Chinese manufactur- ing industry provided a possible source of relief. But this was not feasible since China was technolo- gically ill prepared and developing too slowly to challenge the reality that human labour was too cheap and plentiful to exchange for a decent living.

Sometimes, if too many children had been born, the parents would have to sell the youngest one to keep the family going. Usually it was a girl child, sold as a servant to a wealthier family or into prostit- ution. (4)

Since emigrations are nearly always motivated by pushes as well as pulls, the emigration of Chinese to North America during the 1800's proved to be no exception. The push as provid- ed by a country whose growing popula- tion was confronted with desparate living conditions. As a result, the appeal of news of gold found on the we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that

filtered to the Toishan area via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prospect of starting fresh in a new country convinced many to make the move. The urge to leave was so strong that in some villages as much as thirty percent of the male population went overseas. (5) For some their successes was left to chance, for others became a necessity. Many were leaving families behind who depended on their sons, brothers and husbands as a source of income and sustenance.

'Whatever you do there, you can earn more than here, you'll have something to save and send to us. Maybe you'll stay there thirty years or something, and then you come back.' I said, 'I don't have a family, I'm a single man, if this is what you want, I don't mind.' (6)

The gold strikes of British Columbia attracted not only those who sailed from the homeland, but many Chinese who had gone to California. In 1860, mining records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more Chinese than white miners in the province and three years later, British Columbia claimed a population of 2,500 Chinese. (7)

At first this influx was welcomed. The British Colonist of Victoria declared that:

It would be very impolite on our part with our sparse population to tolerate a species of terrorism that would drive them from the country. We have plenty of room for many thousands of Chinamen...there can be no shadow of a doubt but their industry enables them to add very largely to our own revenues and our circulating medium. (8)

But few prospered from their mining attempts, and most failed to secure for themselves a piece of the golden mountain. Many never earned enough to return and relied on wages in service industries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back home. Too poor to return to China, yet not rich enough to leave Canada, the Chinese entered such fields as mining, farming, fishing and the domestic services.

Upon their arrival to North America, the strong feudal ties that determined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had not prepared them for the reality that awaited them.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homes, the Chinese ventured alone into a society that socially ostracized them, condemning them to lead a life of bachelorhood. Politically, the response of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Chinese was mixed. With one hand, it welcomed the Chinese immigrant as a cheap source of labour and with the other, it effectively barred the entrance of their women -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the Chinese could accept the white man's work, but unlike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 were discouraged from bringing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o settle.

Up until this time, the Chinese were regarded favourably as hard working and industrious people. It was this reputation that secured them jobs as workers on the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 and provided so much of the labour force for the project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envision its completion without this Chinese factor. From an employer's point of view, the Chinese were a source of cheap labour who worked long hours, were often better than their white counterparts. Their presence in Canada was generally favoured. However, the white labour who had previously enjoyed a monopoly were harbouring a growing resentment to these 'aliens' because they accepted

work on a much lower pay scale. (9) Thus a dark light was thrown onto the Chinese situation who were now considered a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he White man's position in the economy.

The way to keep the yellow man out is to get the white man in ... work must be done, and there is certain work which a white man won't do if he can get a yellow man to do it. (10)

If cries were mounting from the public to seek legal action against the Chinese, then the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was to consent to the restriction of Chinese immigration only when it was assured that sufficient cheap labour was available to complete the railway. The initial move came

collection of these taxes to the tune of more than twenty two million dollars in a period of thirty seven years. Those within the country were subjected to restrictions and Orientals from Hong Kong who were British subjects were denied the right to vote in municipal and provincial elections. With their names absent from voters lists, they were automatically disqualified from voting federally and barred from entering the leg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s as well as holding public offic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ere also closed to Orientals in provincial public works and companies holding timber leases and fishing licences were denied by the fishing industry. (11). Hence British subjects of Oriental descent were refused citizenship



from British Columbia which attempted to legislate against Chinese working in the labour force. Their efforts were abort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o didn't want the provinces to interfere with immigration - that was for the state to do and they did, in the form of taxes and restrictions. Indeed, it would have been against the interest of the state to let the provinces interfere with immigration as it benefitted from the low wages the Chinese commanded. When the state was ready to act, it conceded that while it wasn't ready to expell the Chinese, at least obstacles could be set up to prevent them from coming. This resulted in the raising of the \$50 Head Tax of 1885 from \$100 in 1901 to \$500 in 1903. Not only did this action quell discontent, bu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tood to benefit from the

rights, but ironically enough, were fully expected to adhere to such citizenship obligations as payment of income tax and conscription service. The highly exclusionary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passed in 1923 climaxed government action which virtually barred the entrance of Chinese into Canada and was not to be repealed until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12)

Unemployable in public works and barred from unions, prejudice so effectively kept the Chinese out of the labour market that they were compelled to rely on their own resources if they were to survive.

If Chinese were kept out of the white man's labour force, then

certain features of Canadian society made it possible for many Chinese to maintain, if not improve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 The scarcity of white women in the largely rugged and rural west coast placed a high premium on such domestic services as washing, cooking and cleaning. Any services that were available at the time were both poor and costly. As little capital was needed to finance and operate these service, the Chinese penetrated into what was a ready market of laundries and restaurant business. By entering these fields, gone was the need to compete with the white man on an unequal basis as the white man didn't mind the Chinese doing 'women's work'.

As is the case with other immigrant groups, the Chinese occupied the lowest rungs of the socio-economic ladder upon entrance to North American society. But unlike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 the Chinese (and Asian) came to be regarded as a 'menace to the western living standards and civilization.' 13 In addition to the economic factors that blocked their acceptance into North American society, differences in skin color, the foreignness of language, mode of dress and eastern customs contributed to the belief that Chinese were unassimilable into Canadian and western societies. For the Chinese, the lowering of social status in Canadian society was probably the biggest shock the newcomer felt. In the home villages, the overseas Chinese were highly regarded. Remittances enabled families and relatives to live a comfortable life as rates of exchange were higher and afforded the children an opportunity to attend school, a privilege reserved only for the monied.

The Chinese dealt with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that confronted them by withdrawal. Forced to live apart from white society, economically oppressed and the object of racist attacks, the Chinese congregated in largely self-sufficient areas that came to be known as

Chinatowns. With their women effectively prohibited from entering the country, for all purposes, these Chinatowns were no more than elephant graveyards where the Chinese bode their time. As if coercion weren't enough, mounting racial discord resulted in the burning out of Chinese labour camps and settlements. A meeting of the Asian Exclusion League in 1907 climaxed anti-Asiatic feeling when a mob rampaged through Vancouver's Chinatown, smashing windows, damaging shops and beating unsuspecting Chinese. If the hea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pressure diminished after World War II with such concessions as the repeal of the Immigration Act and admittance of wives and children, it was due primarily to the fact that China was fighting on the side of the allie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actions of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create pro-Chinese sentiments. Certainly it would have been inconsistent with foreign policy to engender and tolerate any anti-Chinese activity when the question of China's future was being raised. The post-war period also saw the expansion of North American capitalism accelerated by pent-up internal consumption. Not only was there the need to expand production and create goods and services, but it stimulated a large labour force and increased immigration quotas.

It has only been since the mid-sixties that the Chinese have been given the right to vote and normalize their immigration status. The improved economic status of Canada has resulted in greater social and economic mobility for the Chinese. As the Chinese occupy higher stratas in areas of employment, so the move has been away from the enclaves of Chinatown into the vestiges of middle-class white America. Indeed, most Chinese have accommodated themselves so well that David Hilliard, a black power movement leader calls the Chinese the 'Uncle Toms of the non-white peoples.'

At a time when the economy had room for expansion, such statements as 'racism is a thing of the past' indi-

cated a lax national attitude to immigration. At the time it may have been true, but today with the influx of immigrants from Hong Kong, India and other Asian nations, racism is rearing its head in a country which thought it only existed south of the border. Yet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when a high rate of unemployment, spiralling costs of living, and diminished consumer spending power afflict Canadia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Foreigners have always been welcome in this country and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tolerant society,' says Ann MacDonald, a widow living in Toronto, 'but the way they're coming in now, they're just changing the whole nature of the place and I just don't know if that's what I want.' 14

If the Chinese have made any advances at all, visibility is a factor that prevents total assimilation of the yellow and colored groups into a predominantly white society. Differences in skin color prevented the first landed Chinese from integrating into Canadian society, against whom legal restrictions and exclusionary acts were levied to prohibit their penetration into the economic sector.

Growing up in a period of liberalism where people have greater access to education, it seems hard to believe that racism even exists. Liberals would like to dismiss such a concept as a subversive plot by white xenophobics, but in realistic terms, that such sentiment exists may be indicative of what is yet to come. The rate of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and Asian) in Canada has always been gauged b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limate of the country and given the deteriorating economic condition of not only Canada, but of all capitalist nation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in the midst of reviewing its policy on immigration. Consequently,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hat because of the

growing concern over racism, future immigration policy will result in tighter controls and restrictions will be aimed directly at immigrants of color -- the Asiatics among them.

It has only been with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at all legislative restrictions were lifted on the Chinese in Canada and full residential rights granted them. If the Chinese are to maintain these rights that as an immigrant group had been so long in coming, then it is time they exercised them to ensure that brothers, sisters and futur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re not prevented from making the same claim.

MEI HUA

NOTES

1. John Porter, The Vertical Mosai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2) p. 64.
2. Charles Woodsworth, Canada and the Orient. (Toronto: MacMillan Co. of Canada Ltd., 1941) p. 41.
3. Betty Lee Sung,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4. Victor and Brett Nee, "Longtime Califor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Fall 1972. p. 3.
5. Victor and Brett Nee, p. 3.
6. Victor and Brett Nee, p. 3.
7. Woodsworth, p. 41.
8. British Colonist, July 6, 1861.
9. Woodsworth, p. 78.
10. Woodsworth, p. 78.
11.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Ottawa: Samual Edward Dawson, 1966).
12. Woodsworth, p. 128.
13. Woodsworth, p. 128.
14.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974.

SAI-WOO Restaurant

製作精良

FAMOUS DISHES

裝置華麗

SEA FOODS

CHOP SUEY

SWEET AND SOUR

10% Off For Take-Out Orders
Special Businessmen's Luncheon

SAI WOO

Restaurant

加拿大安省多倫多市登打西街一二四至一三〇號

124-130 Dundas Street West, Toronto, Canada

M5G 1C3 Phones: 366-4988-9



**JOSEPH
LOH**
new
acrylics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the preview:
Monday, January 10
at 8pm.
Exhibition closes
January 22nd

Merton Gallery,
68 Merton Street,
Toronto, M4S 1A1
Tel. (416) 481-1986



家餅華奇

承接



定製

龍鳳禮餅
中秋月餅

各式西餅
結婚蛋糕

生日蛋糕
新鮮麵飽

社團茶會
特別優待

地址

多倫多

溫哥華

正店

261 Spadina Ave.
Toronto,
Ontario.

分店

56 58 Centre Ave.
Toronto, Ontario.
(即大華酒家對面)

217 Keefer St.
Vancouver,
B.C.

電話：368·2969
368·2960

電話：598·0238
598·0239

電話：685·2117